

后现代交锋丛书

如果哈拉维的想法更加广为人知，那将是一件好事。她的这些观念将有助于整个关于基因问题的讨论，包括关于基因食品的争论。

[英] 乔治·迈尔逊 / 著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Donna Haraway and GM Food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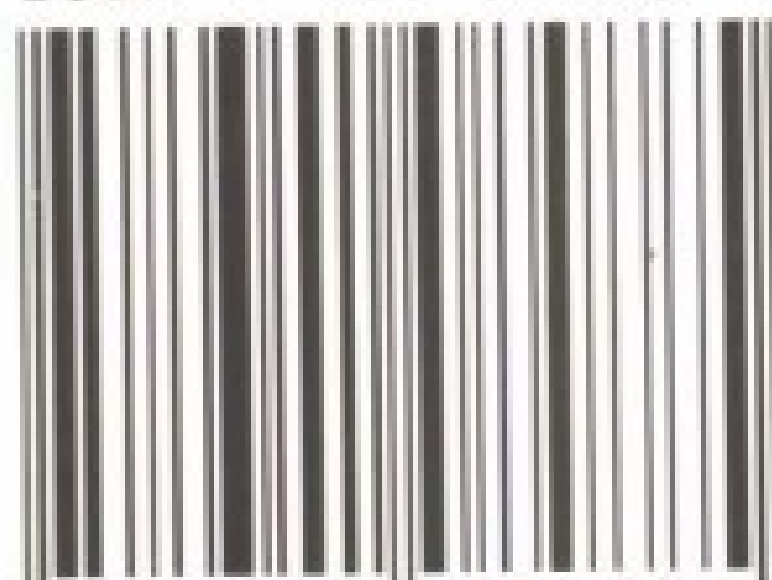


基因改良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是公众关注的世界性话题。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基因的危机和恐惧占据了媒体、政治和伦理的中央舞台。恐慌上升的原因是明显的。基因食品搞乱了自然区化的纯洁性。把鱼的基因连接在番茄的基因上违反了物种间的界限。并且这将是

向着生产杂种的弗兰肯斯坦怪物的人类优生学工程前进的致命的一步。

堂娜·哈拉维,科学学(science studies)领域的一位领袖式的国际权威和激进的“赛博格宣言”的作者,对这场从保鲜番茄到被编制了癌症程序的实验室老鼠——致癌鼠的基因争论进行了剖析。她提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带领我们超越狂热和抗议的僵硬态度,进入赛博格——拼接在一起的消除了“人”和“非人”先在范畴的新存在——的模糊的和不安定的领地。乔治·迈尔逊带我们走上了范围广泛的论战之旅,从绿色和平组织和孟山都公司到遗传学、超级资本主义、万维网和21世纪“女性男人”的黎明。

ISBN 7-301-08488-9



9 787301 084885 >

ISBN 7-301-08488-9/G · 1379

定价: 12.80元

后现代交锋丛书

postmodern encounters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Donna Haraway and GM Foods

[英] 乔治·迈尔逊 / 著

李建会 苏 湛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29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英)乔治·迈尔逊著;李建会,苏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后现代交锋丛书)

ISBN 7-301-08488-9

I. 哈… II. ①迈… ②李… ③苏… III. 哈拉维, D.
—科学学—思想研究 IV. 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5806 号

Donna Haraway and GM Foods

Text copyright © 2000 George Myerso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mora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书 名: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著作责任者: [英]乔治·迈尔逊 著 李建会 苏 湛 译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488-9/G · 13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7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2.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后现代交锋丛书》文字浅显，领域广泛，知识新颖，话题众多，几乎收罗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论述，触及到当代世界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这些有趣而新颖的后现代“时期”的话题，丰富和拓展了后现代多元文化论域，具体化了后现代多维理论层面，使读者能够开拓文化视野，深化问题意识，获得阅读广度，进而有可能在全球化问题框架中思考新世纪的中国立场和文化身份问题。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

后现代主义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王治河（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后现代交锋丛书》是一套题材和角度罕见的作品。

“后现代”可以说是人文社科界和科学界等领域的时髦用语。不过与学术和科学有关的后现代话题往往意味着学术的前沿领域和古奥的词汇，而这套丛书则大胆尝试将前沿学术与大众生活结合，是对前沿学术与科学的普及化，是可读、时尚、前沿的完美结合。

——刘兵（清华大学教授）

《后现代交锋丛书》篇幅精练，但内容的涵盖面却相当广大，涉及西方近十多年来在知识文化界中所产生的许多重大争论。令人惊讶的是，丛书中有几种将当代科技发展的重大发明，如因特网、移动电话，乃至全球化，与直观上毫无关系的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联系了起来，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这套丛书一定会吸引很多读者，使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在饭桌上，或在自己的汽车内，或在就寝前阅读和议论。

总之，欢迎您到后现代世界来！

——金吾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后现代交锋丛书

译审委员会

· 主 任 靳希平 金吾伦 王文华

·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奇智 王文华 王岳川 王治河 丛 中

刘 钢 刘 军 李建会 李醒民 张祥龙

尚 杰 金吾伦 靳希平

· 丛书主持 周雁翎

· 责任编辑 刘 军

· 绘 图 王恩健

后
现
代
交
锋



金 吾 伦 序

金吾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仿佛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我为这套丛书写一篇序言时,我的确感受到了一种挑战,一种“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向“现代性”(modernity)的挑战。出于对这套丛书的偏爱,我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放下了手头的其他工作,认真地读了丛书的每本小册子,难舍地花去我一个多月的时间,以表明我向后现代主义思潮臣服的心声。

这套丛书的总题目是“后现代交锋”(postmodern encounters)。“交锋”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挑战;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内部各种观点之间的冲撞:质疑与回应、批判与反诘、解构与重组,当然,还包括现代性对后现代挑战的回应与反击。丛书虽小,但内容的涵盖面却相当广泛。从历史的跨度上看,丛书所论的人物既有19世纪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有活跃在当代学术舞台上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霍金(Stephen Hawking),甚至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涉及的广度而言,它涵盖西方近十多年来在知识文化界中所产生的许多重要的争论。丛书中有近半数涉及科学与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及社会影响,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霍金、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达尔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科学家和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库恩(Thomas Kuhn)、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及基因改良食品、自私基因等,但议题都是人文议题。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丛书中有几本将当代科技发展的重大发明,如因特网、移动电话,乃至全球化,与直观上毫无关系的哲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联系起来,真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对于丛书所包含的各种观念应如何作出评价,这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之外。我相信读者能自己作出判断。在此我将重点谈谈我所关心的几个问题,即后现代性、终结论、思维方式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来与读者交流与共享。

后现代性

本丛书的主要意图是介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科学及人文诸领域中引发的论争和挑战,通过诸多聚讼纷纭的当代思想文化热点来阐明后现代性是该丛书的主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作一简要阐述。本丛书中《尼采与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作者罗宾逊指出,尼采的许多观点看起来都很后现代,因此,尼采经常被视为当前后现代的祖师爷。也有人评论说:“尼采哲学以其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被认为是现代向后现代

的转折点，并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①

海德格尔也是从后现代的方向反思现代性的先驱者之一。他被誉为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其思想所散发的巨大影响力，“遍及哲学、文学、艺术学、神学、心理分析，乃至建筑学。单就哲学而言，从存在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诠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当前引领风骚的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重要人物，大概都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族谱’中占有一席之地”。^②

后现代是指对文化现代主义和社会经济现代性所作的批判和否定。现代性的本质是力图综合和控制一切，迷恋秩序和权利，强调理性、逻辑、真理、基础和本质，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乃至无情的质疑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创造性，强调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

本丛书还提出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其中如，用发明代替发现，用建构代替实在，不存在进步的目标，价值的破坏，启蒙价值的消逝，超越线性历史，以及激进主义方法论，想象科学，后女性主义，等

①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73

② 见本丛书杰夫·科林斯著《海德格尔与纳粹》。



等。更有甚者,是对科学偶像的质疑,像对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的科学家,指出他们提出的深奥理论在科学家中间也只有少数一些人才能理解^①,为什么他们能成为流行的图腾、全球崇拜的偶像?仅仅是媒体的炒作吗?《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一书的作者在该书结尾时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现代科学家本身正在和真理做危险的游戏,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片面地推向媒体,以便在获取稀缺的研究经费份额的残酷争斗中分一杯羹。这样做可能会有短期的利益,例如得到某些实惠和在电视上露脸,但是从长期看,对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只能更糟。公众对爱因斯坦的反应是绝对的钦佩,但是大科学后来却把核武器给予世界。像牧师一样的被歪曲的科学家形象只可能导致异化,进一步失去公众的尊敬。科学不是宗教,也不应该佯装是宗教。^②

① 2004年7月22日英国《卫报》报道:霍金承认他的黑洞理论错了,输给了他与之打赌的对手、加州理工学院的约翰·普雷斯基尔教授。普雷斯基尔教授在接受了一套特意空运到都柏林的棒球百科全书后表示,能够赢得这次打赌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还补充说:“老实说,我还没有听懂这次演讲。”他说他盼着仔细阅读霍金教授拟于下个月发表的论文。霍金教授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天体物理学家格里·吉尔摩说:“目前大家都没有发表评论,但斯蒂芬并不常常发表这样的见解,因此极有可能他在考虑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可能会过于深奥,不是专家会不太明白,但他并不是在对非专家谈话。”

② 见本丛书彼得·科尔斯著《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

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受到的挑战就更加凶猛、更加厉害了。早在1925年,美国的斯科普斯因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受审;1999年8月,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将进化论从国民教育课程中删除,而提出这种议案的,美国有13个州。有的还建议同时教授“创世论”(即上帝创造世界说)。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的争论还在继续着。至于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们的发现还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持论对立的双方形成一场不大不小的“科学战争”。这在《库恩与科学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如此等等,足以勾画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战斗和纷争。这类战斗和纷争可以说未有穷期。

终 结 论

近几十年来,各式各样的“终结论”(endism)纷纷出笼。“政治终结论”、“社会终结论”、“现代性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科学终结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国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说,随着共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在欧洲垮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也战胜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已成明日黄花,历史也就随之结束,这被称



作“历史终结论”。

正如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在《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福山不是唯一一个宣称历史终结的人。近些年来，许多其他思想家，譬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让-弗朗西斯·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在“终结论”(endism)名目下更大争论的一部分。我们屡被告知，我们现在生活在后现代文化之中，而在这一嬗变之中，终结论常常被看成是后现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①

尽管种种“终结论”纷纷出笼被认为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其实又绝非是一种新现象。许多宗教都曾预言过世界的终结，而且通常预言多次，每当新的千禧年来临之际，终结论就翻出新花样蛊惑人心。当代的终结论与以往的终结论的不同之处，是重在强调现代性的终结——抛弃那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摧毁那些旧有的思想模式和行事模式，承认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德里达强烈地抨击了福山的观点，指出历史不会终结，“历史终结论”只是意识形态的狂妄把戏，“马克思不会这样安静走开的”，马克思的诸多幽灵仍将在欧洲上空，乃至世界各地游荡。我们“除了将历史连同必然相随的幽灵政治学延展开去直至不可

^① 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测的未来以外,我们别无选择。”^①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在宣告“终结论”的破产。“历史终结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福山等人把历史看作是线性的和还原论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混沌论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逐渐揭示出世界的演变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不是还原论的,而常常伴随着新事物的突现和生成。“终结论”给我们双重启示:第一,合规律性不可漠视人的参与,违背人民意愿的政治是不能长久的。第二,世界和历史的演变,除了有渐变过程,还有突现和分叉,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事件的发展进程不是线性的,历史是可以再生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作出正确的选择。

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最先肇始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旨在抛弃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了一种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生的新思维方式,才可能有新的理论和新的行动。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人关于秩序和权利迷恋的一种挑战,现代人“把握自然秩序的希望将导致对自然行使权利。当它被转移到社会领域,变成通过利用社会秩序对人进行驱使时,这一希望便变得很危险。

^① 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而后现代的感悟则对现代人关于‘纯粹理性’的渴望抱持一种怀疑论的态度。它怀疑所谓的理性的纯粹性,事实上掩盖了奸诈的权利关系”。^①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力图撕碎那种现代人精心编织而成的理性网络,给出一幅多元的、全景式的超越旧有思想的图像。后现代主义者不再把一切送上理性的审判台上去审视,而是把它们放进历史实践和经验活动中去考察。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也许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库恩把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引入科学,使“科学揭示真理”的传统受到挑战。拉康则带头反对把“身份、认同”(identity)简化为生理性决定的说法,强调了“身份、认同”中的“协议”(transaction)因素,这种协议因素是非生理性的,也即是与社会文化因素相关联的。这是不是主体性的相对化呢?

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鲍德里亚提出“以想象性的解决问题的科学”来代替传统的科学。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复杂性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符号系统,不断从大众媒体、政治运作、基因工程和数码科技的模型或符码中制造真实,而不只是掩藏真实。这也是麦克卢汉所揭示的“虚拟性”(virtuality),是一种“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也即“虚

^① D.C.霍伊.后现代主义辞典序.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拟真实”。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真实。按《鲍德里亚和千禧年》一书的作者所说:“这个通过模仿模本而得出的现实模本运用不同的相似形式(forms of semblance)取代了过去的‘拟象体系’(orders of simulacra):第一种相似形式是,以保障现实这个原件的真实性为目标的文艺复兴‘副本’;第二种相似形式是工业化‘系列产品’,在这个工业化系列里,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指向某一个具体的原件或者所指对象,它们只有在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随着通讯系统、自动化、晚期资本(late capital,通过形象和意义流通而非通过简单的产品流通)的出现,事先就已经被指定标明了的‘现实’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现实是按照模式和符码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现实就是‘超现实’(hyperreality),即,现在的现实比真实还要真实。”^①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虚拟实在”。^②

这表明了科学认识方法的巨大变迁。董光璧教授曾提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思想有三大转向,即从物质论转向信息论,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和从公理论转向模型论。^③这种科学思

① 见本丛书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鲍德里亚与千禧年》。

② 迈克尔·海姆著.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11-132

③ 王博主编.中国哲学与易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0-



想的深刻转向,我们不妨也可用“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向”来标志它,这似乎显得更具概括性和深刻性,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阐明演变的思想脉络。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的尼采曾使用“阿波罗式”(Apollonian)和“狄奥尼索斯式”(Dionysian)来描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阿波罗式思维方式源自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意指井然有序、平衡和谐和有纪律;而狄奥尼索斯式的思维方式则源自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他常给人狂喜、热情和强健勇敢的精神。尼采批评现代人过度高估了阿波罗式的本质,而丧失了狄奥尼索斯式的本质。尼采所持的观点是,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虽然都是人类心理的重要本能,但是人们却往往只强调阿波罗式的、充满纪律的知识性。尼采主张,发挥狄奥尼索斯精神才能使人强健勇猛,接受生命本身所能赐给我们的最粗暴无理的苦难,同时在人生终结时,能愉悦、情溢辞表、疯狂而又欢快地肯定生命。

高估和只重视阿波罗式本质的是现代人。那么将两者结合,同时兼具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示区别,我认为是言之成理的。

杂种世界：从麦克卢汉到哈拉维

麦克卢汉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与以往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那是各种媒介的混种杂交。在这样的世界里，肉身的人可以与非肉身的人对话和互动。而后女性主义者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则通过她著名的《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又把我们带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杂种世界”，这个世界的大门前飘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欢迎到杂种世界来！

进入这个杂种世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琳琅满目的杂种产品：“转基因西红柿”，这种西红柿由鲮鱼的基因转植，它不再像自然模本那样会快速腐烂，被称为保鲜西红柿；“蛾基因的土豆”，转基因玉米，大豆烟草；由保鲜西红柿和蛾转基因土豆、防烂南瓜等制成的各种各样的食品。

这里是把动物转移到了植物中，植物与动物的界限不再分明了；那边笼子里关着致癌鼠，放养的是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猪……

屋里呆着的、街上走着的人中夹杂着“女性男人”(Female Man)，还有那些类似“外星人”的人。

生产这些杂种产品的是“杂种组织”：跨国企业、新世界秩序公司、信息与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和商业公司的杂合：尼摩尔的杜



邦和德拉凡的威明顿共同组成的生命科技公司，剑桥麻省基地的千禧年研究者和瑞士基地的霍夫曼拉罗合作，同时与其他药厂实验室和实验中心共同寻找接受基因……

这种结合所创造的混杂世界，没有学术中心的起点，也没有商业机构的终点。这个混杂的世界生产了各种混杂的产品。究竟是混杂的世界创造了混杂的产品，还是混杂的产品创造了混杂的世界，并没有清楚的答案。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们已处于一个差异场域下的多重空间，一个认同和边界跨越的复杂关系网络中。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时代，即“后现代”。

潜存于这个复杂关系网络时代背景下的是各种观念。它们正在冲击、荡涤我们称作“现代性”的观念，如“自然”与“文化”的观念，人类与非人类的观念，男性与女性的观念，甚至于超越了善与恶，超越一切古老范畴的界限。这的确是一个各种观点相互冲撞的杂种世界的后现代。

对于后现代主义目前有着许多争论。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无法无视和拒绝，也有人对“后现代”的提法表示困惑。不少科学家甚至坚决反击后现代科学思潮，认为它会对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指责它是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的致命威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击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和争论。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

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前工业社会经由工业社会而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即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特征是“劳力密集”,工业社会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知识密集”,而知识只有在互动中生成发展。为此,我们应该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与争论,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同样必须得到支持。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术事业的繁荣和知识的快速成长与应用。

这套“后现代交锋”系列丛书中的每一本因为篇幅短小,内容新颖丰富,涉及面又广,一定会吸引很多的读者,使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在饭桌上,或在自己的汽车内,或在就寝前阅读和议论。

总之,欢迎您到后现代世界来!

2004年8月



汉 译 前 言

王治河

(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已经遍及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声势之浩大,波澜之壮阔,立意之尖新,分析之犀利,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理论之复杂是当代任何一个思潮所无法比肩的。也正因此之故,任何一个研究后现代的学者无不跃跃欲试,试图把它说清楚。即使不能擒获全豹,至少也要获得一个关于后现代的明晰概念。这些努力都是值得欣赏的。然而如同任何一个美丽的诱惑后面都有一个丑陋的陷阱在等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说清楚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就是:将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进而妖魔化。看一看下面这些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就知我所言非虚。

妖魔化后现代

有学者在国家级哲学刊物上撰文,说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反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乐事。其结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学术商业主义。”也有人称今天社会发生的一切丑陋现象为“后现代乱象”。据说后现代世界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没有意义,“凡生于意义者,已死于意义”。还有哲学界老硕学接着鲍德里亚讲: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而“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



一些人据此对后现代大加讨伐，似乎后现代带给人们的除了“虚无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除了“玩世不恭”，就是“绝望”。更有台湾地区作者将“后现代”与“癌症”连在一起，发明了“后现代癌症”一词。其对后现代之憎恨，之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简单化的态度显然无助于对后现代作认真的学术研究，其背后浓郁的“大批判”色彩也令人忧虑。

简单化对于解说一般事物固然存在着某种便利。但对于阐释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异常复杂、深刻的思想运动，简单化则是研究者应该极力抵制的一种诱惑，因为它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建国后发生在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身上的悲剧，足够惨痛，希望不要在后现代主义身上重演。

因此之故，写这篇前言的此刻，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虽说这十多年来自己一直从事后现代研究，来美读书后研究方向依然是后现代，所师从的又是美国当代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John B. Cobb, Jr.)和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但对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如勒维纳斯和德勒兹的原著所读不多。没读原著，心里便不免发虚。此外，由于浸淫后现代研究这些年，对这些后现代思想大家不免多少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我很怕由于一己之好恶影响了读者的判断。因此我更愿意读者把这篇前言看作我一己学习心得之分享，看作一个邀请，邀请读者与我一起深化对后现代思潮的研究，邀请读者贡献出自己的视角。对于后现代思想家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越多，他(她)的解释就越丰富、深刻。

后现代的故事还没完

尽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少有待克服的理论困难,但我不同意“后现代已经终结”的说法,更不同意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死狗”来处理。这方面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个说法: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公平地说它值得一听,它内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结论是:“后现代的故事还没有完。”^①

后现代的故事没有完不是因为讲故事的人赖着不愿退场,而是因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现代性依然很强势,现代世界观或现代思维方式依然占统治地位。作为对现代性的全线抵抗,后现代自然就还有话要说。

如同后现代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内容。而我更愿意把现代性界定为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科学与精神,理性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所要超越的,后现代思想家所要抵抗的,就是这种现代性。按照著名生态哲学家盖尔的

^① 参见《国际宗教哲学杂志》Vol.50(2001),p.26。



界定：“后现代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相对立，试图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①一般说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前者，即侧重“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侧重后者，即侧重“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可惜的是，或许由于地域所限，这套丛书的编者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鲜有论及，希望后来者在编辑一套新的《后现代交锋丛书》时能弥补这一缺憾。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霸道”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霸道”。求道，闻道，得道都是值得称许的事。唯独这“霸道”，让人难以接受。顾名思义，霸道者之所以霸道，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道，也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也就是说，由于霸占着道，所以霸道。

这种霸道的一个核心表现就是“唯我独尊”，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剥削自然，表现在男女关系上是压迫妇女，表现在理性和感性关系上是蔑视感性，表现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上是科学沙文主义，表现在人我关系上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霸权主义。

从一种多元宽容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向形形色

^① Keller, Catherine and Anne Daniell ed. *Proces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osmological and Poststructuralist Post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32.

色的现代性霸权进行了挑战。

以挑战科学的霸权为例。面对世人数百年来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后现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向我们证实：“西方科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出了错。”^① 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单凭科学与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伽达默尔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寻找养料，特别是从远东寻找养料。”^②

对科学霸权的反思不仅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在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做。印度出版的《科学、霸权和暴力：现代性的挽歌》一书就谴责后殖民国家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过度推崇。作者质问道：“有谁能对邪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跨国公司滥用现代科学不痛心流泪，进而不去审视现代科学的哲学和主流文化呢？难道暴力的根源就不能在科学的本性里找找吗？现代科学是否有某种东西使其成为一项向权力和金钱开放的人类事业？”^③ 捷克总统哈维尔在题为《现代时期的终结》的演讲中也指出，现代科学由于“不能与现实最固有的本性和人类经验最固有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而正在被后现代科学所超越。读者通过本丛中彼得·科尔斯的《霍金与上帝的心智》、《爱因斯坦和大科学的诞生》和蔡汀·沙达

①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4

② 洪汉鼎. 百岁西哲寄望东方. 中华读书报, 2001-07-25

③ 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75



的《库恩与科学战》可以体认后现代对科学局限性的揭示与超越。正是库恩埋葬了许多科学流行的旧观念,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概念,如范式、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收敛式思维、发散式思维,等等(见本丛书蔡汀·沙达著《库恩与科学战》)。

不难看出,后现代思想家实际上帮助我们捅破了“科学万能”的气球。他们并非像一些批评家指责的那样,是“科学的谋杀者”。后现代主义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它所反对的是对科学的迷信,是科学沙文主义。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看作认识他人和世界的唯一可靠模式,同时否定一切不能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科学沙文主义倘若存在一天,中医就一天没有出头之日。

如同科技狂欢时代的守夜者,后现代思想家对科学万能的挑战,使我们避免在科学的颂歌中彻底迷失,对此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从一种复杂性思维出发,后现代挑战了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挑战了现代简单化思维。这套丛书虽然只选取了若干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但其对现代思维的挑战是一目了然的。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不但隐喻着范畴的模糊化,而且也隐喻着各种过去在现代思维模式下鲜明对立两极的模糊(见本丛书乔治·迈尔逊著《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则挑战了我们传统的“现实”概念,以及建立在物质/精神,主体/客体两分思维基础上的镜式反映论(见本丛书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鲍德里亚与千禧年》)。尼采的系谱学则有助于克服人类理性主义的“自鸣得意”(complacency),它并非要摧毁

理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关于自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假定可能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忽略了理性在过去的历史形态,在现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未来的脆弱性(见本丛书戴维·罗宾逊著《尼采与后现代主义》)。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使人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流沙般的东西”(见本丛书菲尔·莫伦著《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维特根斯坦则通过做梦和口误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很神秘的(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企图一劳永逸地把握某种真理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独断症”。

后现代对他者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与党同伐异、态度霸道的现代思维方式的闭锁相比,后现代主义持一种对他者开放的心态。这里讲的“他者”不仅包括其他人、其他文化、其他民族,而且包括女性与自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找到了理论支持。用柯布博士的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使差异拥有了立足之地”。^①

事实上,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对他者和差异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德里达对“分延”、“不在场”和“踪迹”的强调事实上是对他者的开放。用他自己的话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他者(the other)

^① 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50.



的追求”。^①德里达之所以如此推重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②其实,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之所以要颠覆形形色色的现代霸权和现代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目的是为差异,为他者,为弱小争取生存的空间。德里达个人的生活经历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这种尊重他者的哲学立场。德里达曾经坦承,童年时代作为一名犹太儿童,在犹太人遭受迫害和种族暴力(包括犹太儿童被驱逐出学校)时所感受到的极端孤立感。^③虽然日后成为后现代大家的德里达强调他童年的经历与他的哲学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段经历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他者”在后现代另一个掌旗人罗蒂那里也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罗蒂促请人们提升对不熟悉之人群的关注,以避免将他们边缘化。对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方法来说差异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

不难看出,推重开放构成后现代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开放”,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意味着“不阻塞”,也就是“不设界”。^④它让存在物无碍地“相互依

① Derrida, “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Peggy Kamuf,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8), pp.95-96

③ Le nouvel observateur, “An Interview with Derrida” in *Derrida and Difference*, ed. David Wood and Robert Bernasconi,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5.

④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and Thought*, trans. A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106

靠,相互团结”。这种后现代的开放态度是对现代闭锁心态的否弃。诺斯若波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段话清晰地表达了部分先觉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呼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直觉、想象力甚至灵魂向与我们自己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开放。我们必须使学术界将世界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从与整体的关系的角度看待区域性问题的。”^①著名过程思想家苏哈克则将“开放”界定为“存在向新价值的取向”。^②

对于向他者开放的后现代转折,柯布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今天,由于欧洲文化优越论不再统治我们,我们更做好准备向其他文化学习。”^③在柯布看来,“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容,是让不同的社群和团体发出声音”。^④事实上,“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一直是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走到了一起。用柯布的话说,“成为后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多元论的”。

后现代与虚无主义无缘

后现代思想家在挑战现代性的霸权中或许有激

① F.S.C. 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p.10

② Suchocki, Marjorie. “Openness and Mutuality in Feminism and Process Thought and Feminist Action”. in *Feminism and Process Thought*. Ed. Sheila Greeve Davane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1, p.63.

③ John B Cobb, Jr., *Transform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World*, p.31

④ 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p.190.



进、偏颇之处^①，但他们绝对不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更不是一群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始终“怀有乌托邦的梦想”，始终坚持着某种价值，守护着某种理想。在2004年8月《世界日报》发表的生前最后一篇访谈中，德里达强调他的解构主义是站在“肯定生命的一边的”。这使我想起不久前金惠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后现代帝国”的扩张》一文中介绍的罗蒂与德里达的对话。按照罗蒂的说法，德里达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这话我相信。尽管德里达一生大多数时光是在形而上的思想王国里翱翔，但他并未将自己囚禁在学术的象牙塔中。“为人类操心”依然是他的宿命。他曾为捍卫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权利挺身而出，也曾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过顽强的斗争。“9·11”事件后，他也曾写了《9月11日的概念》和《流氓》两篇评论文章。他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②他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也正是这个“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的德里达与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罗蒂和欧洲其他五位思想家哈贝马斯、艾柯、瓦提莫、穆希格、萨瓦特一道于

① 我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96,1998)中对此有所分析。

②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不管是解构性的还是建构性的),都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我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载于《求是学刊》)一文中对这一现象有专门的讨论。

2003年5月31日发出反战强音《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制造了“当代欧洲思想界的轰动之举”。众所周知，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是理论宿敌，两人有长达几十年的恩怨。德里达在解释他和哈贝马斯的不计前嫌的联合行动时说，不管他和哈贝马斯之间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现在都是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因为他们都担忧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①显然，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家与反理性主义、反理想主义、反伦理主义无缘。用霍伊的话说，后现代并非“无方向感”，它不仅与“什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无政府主义无缘，而且也与“一切都无意义”(nothing matters)的虚无主义无缘。^②

尽管用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来界定后现代很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双饱含忧郁的眼睛，骨子里都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

简单化是后现代研究上的误区，因此而导致的妖魔化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吸收养分，实在是误人误己的双输局面。即使以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对它的对手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分析态度。如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柯布就曾充分肯定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长处，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内

^① 夏榆·德里达：我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南方周末，2004-10-21

^② David Hoy, *Critical Resista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Post-Critiq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p.231.



在的假定的解构“有助于揭露和克服给人类带来众多灾难的根深蒂固的‘同化癖’(homophobia)”^①

抵抗“齐一性思维”

看一看现代“同一性思维”，“齐一化”概念，“同质思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例如现代非持续的经济模式的横行，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在华夏大地的肆行无忌，掠夺性的全球化的“压路机”，以一元吞并多元，对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边缘文化的疯狂碾压，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后现代的抵抗心存钦佩。德里达对福山所欢呼的自由资本主义大合唱和“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拒斥就是这一抵抗的一部分（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按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怀特海的分析，“划一的福音(uniformity of gospel)”是“危险的”。^②后现代提醒我们不向“齐一化”的霸权屈服。这使我们怀想起 2000 多年前的庄子，因为正是庄子“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万物之上，从不人为地强求千篇一律，万人一面。他非常反对这种违背天下的常然，违背万物的性命之情的做法”。^③或许因此之故，庄子的哲学被后现代思想家引为同道。

① Cobb, John. B., Jr. "Responses to Relativism." in *Soundings* (Winter 1990), p.73

②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p.206.

③ 樊美筠. 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76

也正是通过对现代“齐一性”思维方式的全面抵抗，后现代思想家捍卫了人类的自由。按照霍伊的分析，抵抗与自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抵抗的动力来自“争取自由”。^①与“辞职”不同，抵抗并未抛弃可能性，它导向希望，也就是导致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关于为什么要抵抗，朱迪丝·巴特勒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心理学区解释：人们之所以要抵抗，不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限制，而且因为自己体认到自己成为这些限制的一部分，自己已经与这些限制自由的东西同流合污。

针对资本主义对人的麻醉化、机械化，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和夸塔里强调与那些要求僵硬的中心性、权威、稳定性的偏执狂和顺从性人格（也就是霸道之人）进行对抗的重要性。因为这种人格不能容忍别人与他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在为德勒兹和夸塔里的名著《反俄狄浦斯》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福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反抗的时候不成为你所憎恨的体制的翻版？如何抗击我们自己身上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就深藏在我们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中，它“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②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海德格尔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海德格尔身上“仍然存留着形而上学的残余”。或许正是这些残余导致他对纳粹主义的青睐（见本丛书杰夫·科林斯著《海德格尔与纳

^① David Hoy, *Critical Resistance: From Poststructuralism to Post-Critiqu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4, 231.

^② 米歇尔·福柯.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天涯,2000(1)



粹》),从而铸成千古之恨。所谓“形而上学”在后现代的词典里系指对“同一”的迷恋。

后现代主义是一剂 不可多得的“药石”

抵抗孕育着希望。作为一股健康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对于疗救现代病,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药石”。后现代对“齐一性思维”的抵抗,对人的自由的捍卫有助于把我们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免做各式各样的机器和动物,如“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经济动物”和“消费动物”。当我们打好行囊准备跟着感觉走的时候,当我们孤注一掷意欲与邻居拼消费的时候,后现代提醒我们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国家,面对列强的霸权,中国敢于说“不”;作为一个人,面对消费主义的猖獗,面对横流的物欲,你是否敢于说“不”?是否敢于依然坚守浪漫?这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另一个挑战。

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者,但他(她)身上显然流淌着浪漫主义的基因,因为它坚信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一味仿效他人在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件可笑复可悲之事。这就是为什么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仅一直拒绝参加风靡全球的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进军自然的大合唱,而且大唱反调。他们看重精神生活,主张过一种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懂得欣赏大自然抒情而生动的意蕴。因此他(她)们是天然的生态主义者。他们相信梭

罗在瓦尔登湖畔悟出的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应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①这，也是一种抵抗，一种高贵的抵抗，因为它需要过人的胆识。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抵抗是否能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尚是个未知数，但它捍卫自由的卓绝努力，它对生命的奇异与丰盈的守望，对浪漫的坚持，是永远令人钦佩的。

展望未来，后现代的一些纯属刻意标新立异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然而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考毫无疑问将会化为经典，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在未来的岁月里“启发我们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②

后现代主义或许有一万条不足，但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它绝对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这实在是个利人利己的双赢结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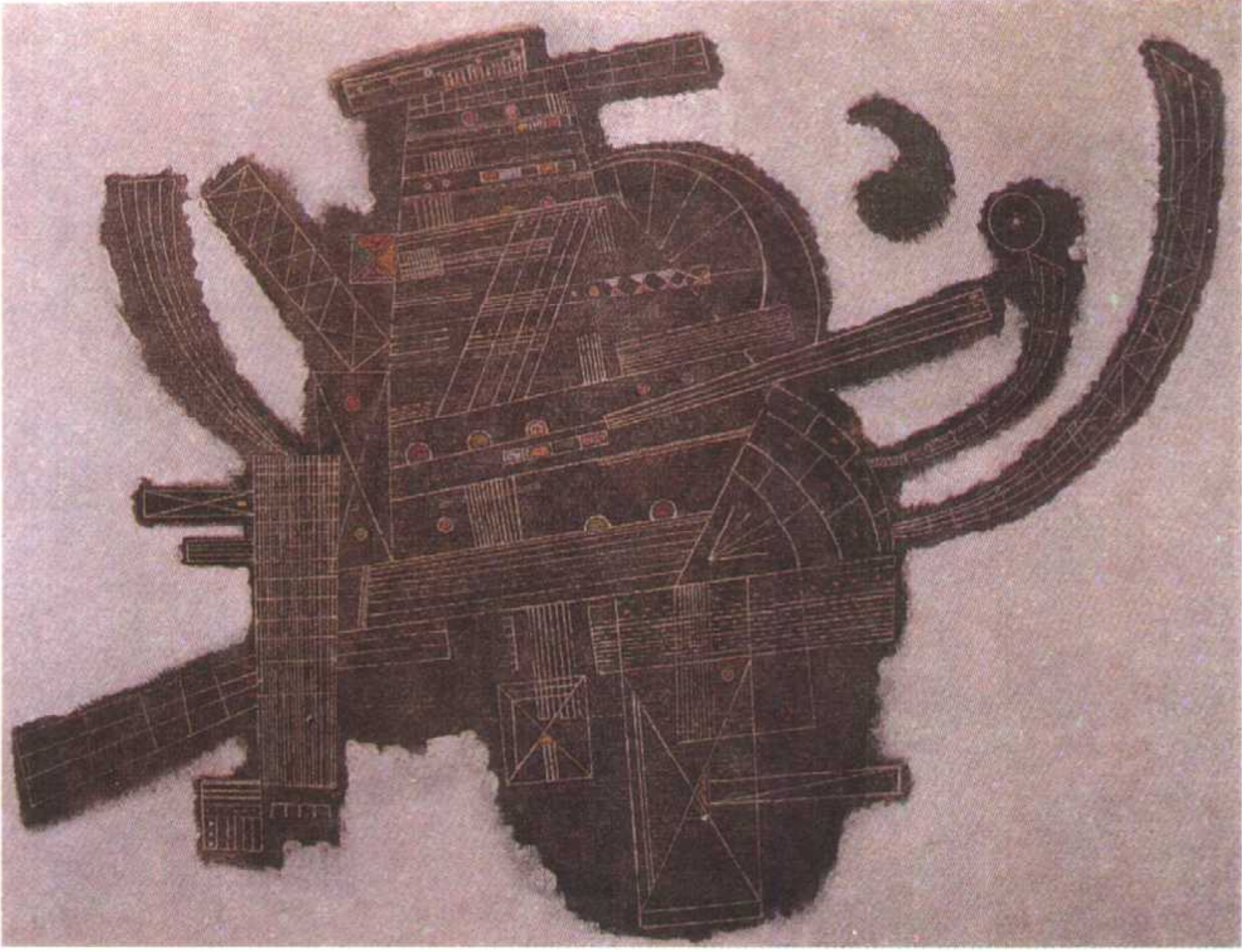
2004年圣诞夜于小城克莱蒙

①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3

②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



康定斯基·构成第八号



康定斯基·绿色音符

目 录

- 金吾伦序 / 1
- 汉译前言 / 15
-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 1
- 行动主义者和人造怪物的奇怪案例 / 23
- 引入外来者 / 31
- 身体、客体和认知 / 39
- 赛博格、番茄和老鼠 / 49
- www.hypercapitalism.com / 57
- 不纯洁的殿堂 / 67
- 让谨慎的见证者变异 / 77
- 变异的大学 / 89
- 转基因的千禧年 / 99
- 超越善与恶 / 111
- 进一步阅读书目 / 121
- 注释 / 124



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引用哈拉维的原话以招摇过市,而是从文本和哈拉维的观点说开去,围绕着GM食品和转基因的话题,广泛联系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街谈巷议的社会热点现象:GM食品的兴起、造势和遭受的质疑,哈佛致癌鼠的专利权官司,基因论战,学究和商人的联合,超级大公司的并购,经济全球化,乃至“科学”观点的可质疑性。尽管作者毫无恶意,但他的笔法却也并非谦恭有礼。也许他的解释并不能代表事实的全部,但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基因论战,更好地看清这些形象,听清他们的声音,无疑是有帮助的。

导读 哈拉维及其 “赛博格”神话



哈拉维(1944—),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在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学科均有深厚造诣。她提出“宁做赛博格,不做女神”的名言。她对于基因改良食品的深入讨论,将我们带入到当代文化中一个复杂而又必须关注的领域。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李建会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跨学科的学者,她在生物学、灵长类动物学、科学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幻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她的思想激进且前卫,她提出了“宁愿成为赛博格(cyborg)而不是女神”的女性主义理论,现在几乎所有时髦的“主义”都可以贴在她的身上:社会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基因改良食品是20世纪晚期生命科技的重要成果,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基因危机和恐惧占据了媒体、政治和伦理的中心舞台。人们之所以恐慌,原因似乎很明显:基因食品搞乱了自然区划的纯洁性。把鱼的基因和番茄的基因连接在一起,打破了物种间的界线,许多人担忧这将是向着生产杂种的弗兰肯斯坦怪物的生命改造工程前进的致命的一步。

在 20 世纪晚期,哈拉维与基因食品相遇!这位激进的行动主义思想家对基因改良食品有怎样的反应?她对于新品大豆、玉米以及外来的(alien)水果、蔬菜,确实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反对吗?那些新的被设计出来的食物难道不是一些强势公司强加给普通百姓的另一种风险吗?谴责贪欲对大自然犯下的暴行难道不是所有进步思想家的责任吗?哈拉维不仅关注基因食品,而且还关注其他类型的新存在,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也不管是实际的还是理论的。由于哈拉维写作一贯地应用隐喻、反讽等手法,所以,读她的书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那就无异于在读天书。下面,我们就对相关背景知识作一简要介绍。

一、哈拉维的生平和著作

哈拉维 1944 年生于美国的丹佛市,自幼就读于天主教会学校。中学毕业后,她在伯特歇尔基金会(Boettcher Foundation)的奖学金资助下,在科罗拉多学院主修动物学和哲学,同时修读英语专业的课程。1966 年毕业后,她得到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来到法国巴黎对进化哲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1972 年,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她在耶鲁大学生物学系以一篇关于隐喻在 20 世纪发育生物学研究中的功能的跨学科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她受聘于夏威夷大学,讲授妇女研究和科学概论,随后又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在是颇具影响的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项目的教授,并曾任该项目的主任。2000 年 9 月,哈拉维因为一生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贡献被授予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的最高荣誉——贝尔纳(J. D. Bernal)奖。

哈拉维的主要著作有《晶体、结构和场: 20 世纪发育生物学中的有机体隐喻》(*Crystals, Fabrics, and Fields: Metaphors of Organicism in 20th Centu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灵长类动物视野: 当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Routledge, 1989)、《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Routledge, 1991)、《如何像一片叶子: 对堂娜·哈拉维的采访》(*How Like a Leaf: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Routledge, 1999)、《哈拉维选集》(*Har-*

away Reader, Routledge, 2003)、《伴生种宣言：狗、人和重要的他者》(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和《谨慎的 _ 见证者 @ 第二个 _ 千禧年. 女性男人 © _ 遇到 _ 致癌鼠™》(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以下简称《谨慎的 _ 见证者》)。最后这本书正是本书介绍的主题。

二、“我们是赛博格”

哈拉维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她 1985 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20 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该文的修改版后来被收集在她 1991 年的论文集《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也被其他许多媒体转载，因此该文的传播非常广泛。该文提出了独特的“赛博格女性主义”理论，因此被女性主义者奉为经典。该文的赛博格概念也激发了赛博朋克们 (cyberpunk) 的奇思异想，因此赛博朋克们也把该文视同他们的“圣经”。

作为一位生物学家，哈拉维一直将生物学作为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自己认识世界的手段。她的第一本专著便是在讨论“生物体的隐喻(Metaphors of Organism)”，而她的赛博格理论正是这种哲学认识路线的继续和深化。

首次提出赛博格概念的是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的两个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科学家从“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有机体)两个词各取前三个字母构造了一个新词“cyborg”。他们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对空间旅行人员的身体性能进行增强。“cyborg”后来被定义为一个人的体能经由机械而拓展进而超越人体的限制或一个人由机械或是电子装置辅助或控制某种程度的生理过程。然而以上定义或实例都完全不能触及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最根本的内涵。

哈拉维把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造物”。(Haraway 1991,149)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的浓缩形象,既是虚构的事物,也是活生生的经验。在当代科幻小说里,充满了赛博格——同时是动物又是机器的生物,居住在自然与

哈拉维与后现代主义

人为之间的模棱两可的世界中；现代医学也充满了赛博格，即有机体和机器的联合，每个赛博格都可以被看作是编码的装置；现代战争也是一种赛博格的狂欢，编码为 C3I（“命令——控制——传播——智能”）。因此，哈拉维说，她要为这样一种观点辩护：赛博格作为虚构物，反映了我们社会和身体的现实，作为想象的源泉，提出了一些非常富有成果的结合（coupling）。

所以，哈拉维宣称：“在 20 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喀迈拉^①，是理论化的和拼凑而成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血儿。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Haraway 1991,150）

根据哈拉维的观点，赛博格神话使自然、机器和人的关系改变了，因为赛博格穿越和搅浑了技术史中习以为常的边界。哈拉维认为，在 20 世纪晚期美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已经经历了三个关键的界限

① 喀迈拉(chimeras)，希腊神话中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妖怪，可以引申为荒诞不经的妄想或由奇形怪状的、不相干的部分组成的怪物。遗传学上用这个词来指由不同亲本种类的 DNA 结合而产生的生物体，可译为嵌合体。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名叫喀迈拉的妖怪是一位女性。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突破。第一个界限突破是人类与动物界限的突破。她指出，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令人信服地把人与动物区分开，并且这样的区分没有什么必要。动物权利运动不是对人类独特性的非理性否定。过去两个世纪的生物和进化理论已经把人和动物之间的界线减少到只是一个微弱痕迹。赛博格恰好出现在人与动物的界限被超越的神话那里。

第二个界限突破是人与机器界限的突破。“20世纪晚期的机器已经完全模糊了这样的差别：自然与人工、思想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许多其他的用在有机体与机器上的区分。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栩栩如生，而我们自己却令人恐慌地了无生气。”

第三是自然的与非自然的界限的突破。哈拉维指出，现代机器是精巧的微电子设备：它们无处不在而又看不见。她说：“我们最好的机器是由光组成的。它们都是轻而清洁的，因为它们不是别的，就是信号、电磁波、光谱片段，并且这些机器都是不寻常的、便携式的、移动的。”在这里，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没有区别，因此，哈拉维说“赛博格是以太，是精华”。(Haraway 1991, 153)。

总之，高技术的发展对既存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系列区分提出了挑战。所以，哈拉维说：“我的赛博格神话是关于跨越界限的。”(Haraway 1991, 154)哈拉维提出赛博格的目的是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解后的一个新的主体，她想借着这个新的主体来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族群、种族、性别、阶级等）彼此矛盾冲突的困境，同时建构一个“多元，没有清楚的边界，冲突，非本质”的主体概念。哈拉维说，从一种角度看，赛博格世界是关于星球控制的最后的强加事物，是关于以防卫名义发动星球战争灾难的最后抽象，是关于男性战争肆虐中对女性身体的最后占用；从另一种角度看，赛博格可能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在其中，人们不再惧怕她们与动物和机器的亲属关系，不再惧怕永久的部分认同和矛盾立场。赛博格没有也不要起初完美的合一，它坚定地表明自己的偏好、反讽、亲密与任性，它是对抗性的、乌托邦的和完全非天真纯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也早已不再是纯粹的上帝用泥土塑造的那个造物，不再是纯“自然的”。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制造出各种机器以代替我们的双手、双脚、耳朵、眼睛、舌头，乃至大脑，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从制造机器，进而演变成寄生于机器当中，机器已经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肢体的延伸——或者是人成为机器上的一个组件——或者他们都是赛博格身上的器官。来自上帝之手的人体已经和来自人类之手的机器拼接在一起。

正如之前看到了生物体所带来的隐喻一样，哈拉维也看到了赛博格带来的隐喻——它模糊了所有范畴乃至对立的两极的界线；它不是由处于完美状态的原生统一体分化而来，因此不需要“复乐园”，不需要“人性的回归”；它是一个混血的杂种，可以充分适应一个充满怪物的世界，而非理想世界、乌托邦或上帝之国。

所以，哈拉维说：“我宁愿成为一个赛博格而不是女神！”(Haraway 1991, 181)

三、女性主义的科学观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思想家，哈拉维不仅提出了

独特的赛博格女性主义，而且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科学观。这种女性主义科学观不是经验论的，也不是立场论的，而是后现代主义的。

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科学从本质上说应当是客观普遍的，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严格公认的程序。然而在现实科学实践中，由于占主导地位男性研究者可能没有严格按照科学方法行事，结果使科学中存在严重的男性主义偏见。科学运作分四个步骤：选择课题，实验操作，数据解释，解决问题。经验论认为，科学研究的这每一步都可能渗入性别偏见。比如，在选题过程中，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来承担课题？诸如此类问题都由科学权威来定夺，而这些权威大多都是男性，而女性往往处于科学共同体的边缘，无法参与决策。因此，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现实的科学，特别是现实的“坏科学”充满了男性主义偏见。要克服这种偏见，需要在科学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让更多的妇女进入科学领域。随着科学共同体中女性人数的增加，科学中的男性主义偏见就会减少。所以，女性主义经验论并没有超越主流科学的话语，只是对它进行了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在这里，科学



方法仍然需要,但性别偏见必须剔除。

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传统认识论所倡导的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是不存在的,任何知识都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和特殊的人类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女性主义立场论还坚信,作为边缘人群和被压迫者的女性,不论是在解释社会政治问题、宗教信仰,还是在解释生物、物理问题和社会现象上,先天具有更大的认识优势。她们的生活经验为达到更少偏见、更客观的知识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背景。所以,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倡导以被忽略和贬抑了的女性生活经验为来源实现最大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立场论一样反对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科学的目的并不是发现实在世界的真理。但是与女性主义立场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具有优势认识论地位的女性经验。女性身份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对应于不同的种族、阶级、民族中的妇女,她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所谓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是不存在

的。相反,存在的是多重的女性经验和立场。所以,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普遍性话语,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存在于具体化的实践中,存在于具体化的和历史的特殊情境里。

哈拉维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许多学者批评她过于相对主义,也有人批评她的社会建构论立场。对此,哈拉维有她自己的见解。在1999年的自传性访谈录《如何像一片叶子》中,她提到,从她著名的《灵长类动物视野》开始,就有人疑虑她相对主义。但她说,如果她重写,她会给他们更多的证据,告诉他们:“我知道,而且在乎你们的想法。”她批评一些人对她的误读和断章取义:你谈历史偶然性,他们听见的是相对主义;你谈物质与符号的同时性,他们听见的是单纯的社会建构论。同时,在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她流露出的试图回避现实主义与相对主义(realism and relativism)之争的陷阱的愿望。

四、基因食品的文化解读

哈拉维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一脉相承的特性,它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们都是关于科学同时也是关于文化的。特别是《灵长类视野》、《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和本书介绍的《谨慎的 _ 见证者》，甚至被哈拉维戏称为“三部曲”，哈拉维本人试图用自然的(natural)和文化的(cultural)这两个概念来实现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的目的。其中，《谨慎的 _ 见证者》是最新的一部(1997)，也是内容最为庞杂的一部，从哈佛的致癌鼠到互联网，从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作物到女性男人，甚至有人将这部书视作哈拉维从科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

对于当代大多数西方左翼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而言，基于分子遗传学的现代生物技术是一种值得提防的、包藏祸心的东西。其中，转基因技术是遭到最激烈质疑的生物技术之一，质疑转基因技术的主要理由，比如“基因污染”、转基因蛋白的安全性等，也已逐渐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广泛接受。至于转基因生物，这些被人类设计出来的生物，对它们有一个流行的而又很贴切的描述——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作为一位在左翼思想家中被奉若神明的先锋人物，哈拉维和她身边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对转基因技术和弗兰肯斯坦博士们没有任何好感。然而对于

转基因生物本身，哈拉维的看法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哈拉维眼中，转基因生物——无论是以保鲜番茄为代表的基因改良(GM)食品，还是以致癌鼠为代表的实验用转基因动物，它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妖魔”形象。正相反，哈拉维对这些生物另眼相待——在这些转基因生物身上，她看到了赛博格的典型形象：难以划分其范畴，不知其父母、高度的女性化……

转基因生物是拼合的，所以难以划分范畴。这种拼合不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用完整、独立的零件对整体进行的组装，而是说，它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从肌肤到骨髓，无一完整，无一“自然”——它们都是用来自不同细胞的成分拼合而成的。这种拼合不但超越了物种的界线，而且跨越了动物和植物的界线——从鲑鱼到番茄、从天蚕蛾到土豆……

转基因生物的出生是非正常的，所以不知其父母。它们不但是非婚生的子女，而且是非有性生殖的子女。然而怪异的是，它们同样不是单性繁衍的产物。事实上，它根本没有父母。它的出生途径根本是非正当的——不是通过母亲的子宫，而是古怪地，通过人的双手，被生殖出来的。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转基因生物是为别人的目的而被调制出来的，它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自我缺失而不被重视，脆弱易受伤害而且正在被伤害——因此，它是高度女性化的。本书选取了致癌鼠，这个被哈拉维选中作为书名的代表形象。它不仅是作为工具被生产出来的，也不仅是正在受难的，而且是被专门设计出来受难的。不像试图创造完美却一不小心创造了怪物的弗兰肯斯坦博士或上帝，致癌鼠的创造者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地在它的编码中写入缺陷、疾病和短暂的生命。非但如此，在这里，女性化也与非完整化、拼接化、模糊化重叠到了一起——致癌鼠不但作为可以被随意处置的非主体而被占有着，而且它的所有权也是拼合的、模糊不清的：哈佛大学的专利权和杜邦公司的专利权。

也许，转基因生物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赛博格形象，但是无疑，它们一定是最具代表性的赛博格形象之一。更重要的是，透过 GM 食品和其他转基因生物，我们的眼光与它们相互围绕着旋转的其他赛博格连接在一起：使基因技术成为可能的数据库、经营转基因产品的商业机构、设计转基因产品的研究机

构……而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争论焦点之一，转基因生物——这种身上充满了模糊性的赛博格，它还带来了另一个启示：它使得一切关于它的意见、立场、态度，无论是它的支持者还是它的反对者的阵营，都模糊不清了。对于转基因生物的评判，不能再以正确或错误来一分为二了。如果在“二战”时期，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还可以众口一词地谴责纳粹和曼哈顿计划，以证明自己既是和平主义者，又颇具人文关怀，那么在基因问题上，已经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正确的立场了。是高唱人文关怀，反对唯利是图的大公司的激进主义者，还是对新生事物充满恐惧的保守主义者？是为保护大自然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潜力而奋战不息的绿色和平主义者，还是在血统纯化论、优生学的旗号下，泯灭人道的纳粹主义者？是怪异恐怖的科学狂人，还是以苍生福祉为念，锐意进取的知识和财富的创造者？以上种种形象，在基因论战的舞台上，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模糊。

“模糊性”(ambiguity)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成“二重性”、“模棱两可”，然而二重性不同于二分法，这并不简单地一分为二：“这么做有好处，也有缺点；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那么做也有好处，也有缺点……”转基因生物带来的模棱两可决不是像这样的政治家式的含糊其辞的诡辩术。转基因生物所带来的模棱两可、二重性或模糊性，既不是两边都对，也不是两边都不对，更不是既对也不对，而是原本就没有确定的好处和缺点，根本无从判断对还是不对。

这的确很怪异，但这正是转基因生物和其他赛博格带来的。记得曾几何时，在我们的童话中，我们习惯以简单的二元对立——好—坏、对—错——来评判世界。而当我们长大了，不再阅读童话，我们开始学会更复杂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再使用单纯的“好”、“坏”来作为我们评判的尺度。同样的过程，现在摆在整个人类面前，政治左翼——政治上正确，也许已经不能作为被认作同一的关联词，因为“政治上正确”已经模糊，而且正在破碎——在这里是在基因论战的舞台上，而在其他赛博格那里，它不知又要在哪座舞台上，以何种方式模糊起来，破碎下去。而这也许正是赛博格最大的意义所在，正意味着人类的童年开始终结。

因此，哈拉维不但要为转基因生物辩护，还要站

在它们当中,成为它们的同胞,它们的姊妹。因为它们,正是赛博格世界理论的忠实的体现者,和实践者。

五、关于本书

本书正是对哈拉维这部写于1997年的作品的导读,同时,它也是作者对于哈拉维哲学思想的一种解读。在本书中,作者乔治·迈尔逊以GM食品作为切入点,将《谨慎的_见证者》中庞杂的内容串联一体,并通过研究哈拉维对GM食品的态度,深入到哈拉维的世界中,向我们展现了哈拉维看待转基因生物的与众不同的视角。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引用哈拉维的原话以招摇过市,而是从文本和哈拉维的观点说开去,围绕着GM食品和转基因的话题,广泛联系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所街谈巷议的社会热点现象:GM食品的兴起、造势和遭受的质疑,哈佛致癌鼠的专利权官司,基因论战,学究和商人的联合,超级大公司的并购,经济全球化,乃至“科学”观点的可质疑性。同时,书中还涉及一些在基因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当世显贵,从通常被视作反派的大资本代表孟山都公司,到通常被视作正义化身的左翼力量代表



导读

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

“绿色和平组织”，还有一些在西方主导文化中颇受尊敬的殿下或阁下们。尽管作者毫无恶意，但他的笔法却也并非谦恭有礼。也许他的解释并不能代表事实的全部，但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基因论战，更好地看清这些形象，听清他们的声音，无疑是有帮助的。

对于希望迅速而简明地了解哈拉维哲学思想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失为一本不错的入门读物。然而如果只把本书当作哈拉维思想的简要介绍或《谨慎的—见证者》的导读，那也是一个误会。书中的主张和对我们心灵的拷问，不仅是代表哈拉维发出的，也是本书作者乔治·迈尔森自己的声音。即使你不关心哈拉维怎么说，只要这本书能够给你一种新的审视转基因以及其他后现代存在物的眼光，本书即达到了它的目的。



《谨慎的 _ 见证者》不是一本让人仅仅从头到尾读过就算完事的书。全书充满了呼应与联系、重复与回返。书中不乏学术式的注脚和对同行学者、专家的大量引证。然而书中的语调非常流畅。某一刻,我们可能正在阅读对一个论证的评论;下一刻,我们可能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笑话、或者一段个人回忆上。在某些方面,《谨慎的 _ 见证者》很像一部小说,哈拉维从幻想文学中汲取的素材和她从学术源头汲取的一样多。

行动主义者和人造怪物的奇怪案例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Activist and the Monsters



“我发现自己被这种新的存在——比如带有深海鳐鱼基因的番茄——所吸引……”

行动主义者和人造怪物^①的奇怪案例

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中的一位领袖人物,也是科学与文化领域的一位主要思想家。^[1]她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行动主义者,是那些寻求反对剥削——包括利用大笔财力和物力对环境进行剥削——的人们的盟友。你期待她对基因改良(genetically modified)食品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期望她有怎样的反应?对于新品大豆、玉米以及外来的(alien)水果、蔬菜,她确实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反对

① 这里说的“怪物(monster)”这个概念来自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说中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博士把来自不同躯体的器官拼在一起,制造出一个邪恶的怪物,并被这个怪物害得家破人亡。哈拉维的很多作品涉及这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作者在此以“怪物”指代基因工程制造的“人造物种”。——译者

吗？因为我们听说它们是来自弗兰肯斯坦博士花园中的存在（beings）。那些新的被设计出来的食物难道不是一些强势公司强加给普通百姓的另一种风险吗？那么，谴责贪欲对大自然犯下的暴行难道不是所有进步思想家的责任吗？

哈拉维自知这种期待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乐于知道我们的思想家来自何处，恰如我们乐于知道我们的食品来自何处。她认识到，根据“政治左翼——我的政治领地”的观点，人们是不会欢迎“分子遗传学、生物技术”和其他此类技术发展的。这不正是“牟利和剥削”的新手段吗？^[2] 哈拉维不是孟山都（Monsanto）^① 和其他基因妖魔的爱好者，同时，她能感觉到来自她的天然支持者——激进的行动主义者和现有制度的批评者的拉力。然而，她做出了一个坦白，正是这一坦白设定了一场“后现代的相遇”（Post-modern Encounter）：

我发现自己特别被这种新的存在——比如
带有深海鲈鱼基因的番茄——所吸引……

① 孟山都公司，美国著名的化学和生物技术公司，曾经是全美最大的阿司匹林生产商。20世纪60、70年代，其主要业务逐渐转向农用化学品和种子，80年代以来成为生物技术界的领军企业。——译者



她怎么能这样？而且这还没完！哈拉维也着迷于“携带有来自巨蚕丝蛾基因的土豆”。^[3]于是，我们就在这位深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和过去几年充斥在报纸头条上的怪物之间相遇。

这场相遇的场景就是哈拉维出版于 1997 年的书，这本书有一个怪诞的标题：《谨慎的 _ 见证者 @ 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 _ 遇到 _ 致癌鼠™》^②。正是在这本书里，她做出了她的坦白。她更一般的目的是对千禧年之交我们面对的新世界作出答复。除了基因食品，哈拉维还关注所有其他类型的新存在，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生物学的，也不管是医学的，还是理论的。她的书是关于一个新世纪的观念，而这个新世纪的核心是“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旧科学和技术的新杂种。她想要知道，女性主义应当从这个新的黎明中了解到什么？进步的社会批评家应该如何对那些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脉络里和我们所有思想景观中既现实又迫切的变化作出应答？

② 哈拉维像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家那样，故意将 FemaleMan 和 OncoMouse 等单词写成人名形式。OncoMouse——致癌鼠指人们为了进行医学研究而故意在其身上植入癌细胞的小白鼠，©和™分别是代表“版权所有”和“注册商标”的符号。——译者

如你所见,这位《谨慎的 _ 见证者》是一个奇怪的事物。但它有三个清晰的部分:在第一部分,哈拉维对技术科学做了一个说明;在第二部分,她介绍了她的“相遇”——行动主义者与水果之间的相遇,致癌鼠(OncoMouse)与女性男人(FemaleMan)之间的相遇,以及其他各种奇怪存在之间的“相遇”;第三部分以总揽全局的眼光对“基因”与“胚胎”、“种族”与“事实”等问题进行了前景展望。她与果园中新水果的相遇发生在第二部分,然而其寓意却回荡在整部作品中。《谨慎的 _ 见证者》不是一本让人仅仅从头到尾读过就算完事的书。全书充满了呼应与联系、重复与回返。书中不乏学术式的注脚和对同行学者、专家的大量引证。然而书中的语调非常流畅。某一刻,我们可能正在阅读对一个论证的评论;下一刻,我们可能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笑话、或者一段个人回忆上。在某些方面,《谨慎的 _ 见证者》很像一部小说,哈拉维从幻想文学中汲取的素材和她从学术源头汲取的一样多。例如,她创造典型人物,或者把思想观点看作好像就是典型人物。而她本人连同其他被怪异命名的存在——实验室里的老鼠和女性男人一起,成为



她自己世界中的又一个典型人物。一旦离开阅读这本书的经验,你就无法从中获得信息。因此,我将尽力重建这种阅读经验,以便理解“这个行动主义者和人造怪物的奇怪案例”。为什么堂娜·哈拉维着迷于带着蛾子基因的土豆和嵌入了鲟鱼基因的番茄呢?

行动主义者和人造怪物的奇怪案例



作为外来蔬菜和水果的“先锋”，保鲜番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想想吧：番茄可是无处不在——沙拉里当然有它，但是，更多的是在沙司和比萨里，也在派和三明治里。人人都已经吃腻了你在超级市场里买到的已经没有什么味道，在舌头上变得粉粉的，一点也不爽脆多汁的平凡的地球品种。保鲜番茄也是一个伟大的选择，因为它几乎根本不是一个外来者。它只不过是地球番茄寻常基因构成有了一点点改变而已。

引入外来者

*I*ntroducing an Alien



哈拉维的书本身就可看作是一个赛博格：研究报告和信仰声明、历史和预言、学术分析和诗化的想象的结合体。

引入外来者^①

1994年5月，专家们看到了一个外来存在(alien being)向我们熟悉的行星飞快地行进。这个客体(object)，或曰造物(creature)，像所有最高明的外来入侵者一样，深藏不露，装扮得看上去是某种明显无害和常见的东西——某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以遇到的东西。通常，外来者都把自己伪装成常人的样子，就像你我，或者我们的邻居。然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个外来者的狡诈。不管他们看上去有多么“正常”，毕竟，

① 原文中这一节的标题是(Introducing an Alien)。“Alien”一词直译为“外来者”，并且它也是一部著名科幻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字叫做《异形》。在电影中 Alien(或异形)指的是一种外星生物，它凶猛、残忍，而且能伪装成人类的样子。所以作者在下文提到“通常，外来者都把自己伪装成常人的样子……”下文中的“外来的”和“外来者”也都译自“alien”一词。——译者

有多少人会邀请陌生人到自己家做客呢？不，那只是先前外来者阴谋中的一个纰漏。这一次，外来者们有一个新计划。它们不再把自己冒充成平常人。相反，它们把自己伪装成最谦卑和有着最和善面貌的客体。是的，它们把自己装扮成蔬菜！回想起来，这种狡诈真是难以置信，就连专家和权威人士几乎都被它蒙骗！

像所有最高明的人侵者一样，外来者们太狡诈，以至于它们不会在密集的人群中登陆。相反，它们事先派出一个最好的间谍，来尝试它们的这一策略。这多有可能成功啊！回想起来，有人怀疑，这个外来者的高招在于它已经在内部种下了帮手。这个外来者在抵达时并不孤独、无助，相反，它事先早已精心准备好一切。5月18日，开始有消息出来麻痹公众，而且理所当然，尤其是麻痹美国公众，使他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美联社(AP)在全大陆发布了一则含义隐晦的报道：一位来自新的、更高文明的“先锋”正在降临。5月19日，美联社用更为响亮的声音宣称，这种新的存在将“很快进入你附近的商店”。

此后几天，各种肯定的消息以令人生疑的后知



后觉的方式开始散播。美联社在5月19日向读者保证,他们即将获得的好处将会远远超过旧的“大自然母亲”打算赐予他们的。听听这动人的声音吧:这种存在将是“诱人的”;它是某种我们“经常并且强烈”期待着的東西;它被美国最高当局鉴定为“安全”的。至此,这个策略已经成形。这个外来者不再隐藏在常见的蔬菜形式后面保持安静并期盼生存,相反,它开始为自己迫在眉睫的到来仔细策划。这真是一条近乎大功告成的精妙设计。

关于这位外来者先驱的登陆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让外来者的伪装更加完美无缺。因为,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都宣称,我们即将遇见一种新的“美国番茄”。

这个外来者不但拥有最无害的可能形状,而且甚至被鉴定为美国商标。这就是正在来临的保鲜番茄(Flavr Savr)^①,即所谓的“基因加工的美国番茄”。从它到达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是我们内部中的一员

① Flavr Savr 牌番茄,孟山都旗下的 Calgene 公司研制的转基因番茄,1994年到1995年间上市,是世界上第一种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作物。Calgene 公司采用反义 RNA 技术,抑制了使番茄变软的基因,从而避免番茄在运输途中腐烂。——译者

了。确实,它自愿服从美国食品和药品(US Food and Drugs)管理机构详尽的测试。在它降临的征途上,这个外来者甚至还吸引了总额高达2千万美元的地球投资!

作为外来蔬菜和水果的“先锋”,保鲜番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想想吧:番茄可是无处不在——沙拉里当然有它,但是,更多的是在沙司和比萨里,也在派和三明治里。人人都已经吃腻了你在超级市场里买到的已经没有什么味道,在舌头上变得粉粉的,一点也不爽脆多汁的平凡的地球品种。保鲜番茄也是一个伟大的选择,因为它几乎根本不是一个外来者。它只不过是地球番茄寻常基因构成有了一点点改变而已。

作为一位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化评论家,堂娜·哈拉维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位上,使她可以看破这一策略。一些人认为,这种番茄不是真正“转基因的”(transgenic),不是一个有着奇怪的新基因模式的真正外来者。这是因为它与正常番茄的区别只在于它拥有一个颠倒的基因。这个基因的作用是操纵番茄成熟,继而,就像意料中的那样,腐烂。如果这



个基因颠倒了,那么番茄就会更持久地保持新鲜。然而,哈拉维发现了另外一个无意间泄漏的变化。在她看来,这种新的美国番茄是“严格转基因的”(strictly transgenic),因为它拥有一个从外源细菌插入的基因。这个基因过去常常用来追踪其他基因的变化,而不是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然而,正如哈拉维所说,它不是平凡的番茄:隐藏在它的代码中的是一种外来成分,就现在来说,它很小,并且毫无疑问是无害的,然而,就它们的结果而言,终究是外来的。^[4]



哈拉维用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命名她的书，而不是用一个常规的标题，也许是给新世界贴上的又一个新标签。她正在搭建几个新世界之间的联系。一个世界是保鲜番茄以及其他存在的世界，比如我们不久就会遇到的致癌鼠(OncoMouse)。另一个是“女性男人”(FemaleMan)产生的文化世界，“女性男人”是一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角色，也是旧分类正在瓦解的一个征兆。

身体、客体和认知
Bodies, Objects and Knowledge



“赛博格”，体内装有现代机电设备的受控有机体，使自然、机器和人的关系变得日趋模糊和复杂。

身体、客观 和认知

在欧洲,这位“先锋”番茄后来撤退了。今天,“基因”与“食品”之间的联系几乎不再占据任何人的大幅广告,尤其是欧洲。即使在对基因食品较友好的美国,生物技术工业也只有招架之功。回顾那篇刊载于《卫报》(*The Guardian*)(1994年5月21日)上代表英国和欧洲欢迎这种番茄的文章——带着对“我们日复一日消费掉天文数字的基因”的再度肯定,有些东西是颇能感动人的。就像莫里哀故事中的人物认识到自己始终在谈论散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始终在吃基因。而且,所有食品都有基因,但有些食品比其他食品有更多的基因。最近关于基因改良玉米的论战清楚地说明,即使对于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而言,这些外来

者在被当成人们的朋友看待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话题看起来已有定论,外来者已经被迫退回到它们的太空船里了。

让我们跟随哈拉维,跟随她回忆 1994 年 5 月的那个重要时刻,以了解为什么这不可能是故事的结束。《谨慎的 _ 见证者》第二部分对现代科学做了一个说明。在 19 世纪,就像她讲的,化学通过元素周期表为无机世界带来了秩序。这张表指导科学家预知各种尚未发现的元素的存在,包括铀。然后,科学又给这张表格添加了天然生成的元素,重大的增加包括钷和其他“超铀元素”(transuranic elements)。同时,进化论和遗传学也为生物学领域带来同等的秩序。人类同属于这两个系统。

接着,哈拉维打断了她自己的故事:“就在 1994 年 5 月 19 日我写下上述段落的那一天,整个美国的报纸头版都在报道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最终核准了卡尔基因有限公司(Calgene, Inc)……将基因工程番茄——即保鲜番茄(Flavr Savr)——投放市场。”她把 1994 年 5 月 19 日看作科学和社会史上的一个特别的“红日



子”^①。确实,这里有一点嘲讽的感觉。但是在语义的模糊性(ambiguity)中,她继续解释为什么这种番茄如此意义重大。保鲜番茄不像自然生长的番茄那样“腐烂得很快”。这种以工程方法减缓腐烂速度使得“转基因”(transgeneic)番茄和“超铀”(transuranic)元素钚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确的类比,钚的半衰期的延长恰恰是核能危险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5]

哈拉维把先锋番茄和放射性能源——钚并列,成为三位一体中的两个“关键的合成物”(key synthetic objects),此三位一体定义了“第二个基督千禧年最后一个世纪的几个阶段:尼龙、钚和转基因技术”。^[6]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客体(objects),它们也是“革命的新世界公民”。它们是一些一出现就使整个世界发生改变的实体。日常生活的组织和结构在这些存在面前转换了,并且历史不会重演。它们是新型的客体。它们的相继出现完全修改了作为一个客体的意义。它们重新划定了地球上物体的界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尼龙来自“合成有机化学”,钚来自“超铀原子核生

^① “红日子”这个词原文作“red-letter day”,西方有用红色在教堂日历上标志出宗教节日的习俗,这个词由此而来。作者在这里用“red-letter day”这个词多少包含了对转基因技术重要意义的暗示。——译者

成”，最后，我们也有了“基因工程”的贡献。这个观点再清楚不过了。世界无法在保鲜番茄出现在我们面前后再退回原状，正如它无法在尼龙或钚发明后退回原状一样。

然而，这正是不确定性之所在：这种新的遗传客体将会是又一个钚，还是又一个尼龙呢？这股外来客体的新浪潮将是致命的入侵还是一种有益的充实呢？哈拉维没有说明，她不想给出答案。相反，她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眼睛引向这个以保鲜番茄为表象的历史瞬间的深刻不确定性：“转基因生命体既是完全普通的东西，又是科学幻想的素材。”如果你非常清晰地看这些客体，你将会失去你所有的确定性，并且你发现自己正面对着问题的视野。这些新事物是下一个“世界—塑造(world-shaping)”科学的化身：它们对生物学的意义将正如钚对于物理学和尼龙对化学一样。^[7]

《谨慎的 _ 见证者》希望我们拥有一种讨论这些新存在以及讨论它们出现时我们的新经验和新感觉的语言。哈拉维一再让我们返回到她的关键词“转基因”，并且为我们定义了“转基因生命体”(transgenic



organism): 即拥有跨生物界限“转植”(transplant)基因的生命体,跨越的界限可能是物种,甚至也可以是不同的生物王国——例如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根据她的说法,最终不得不与世界分享这样的实体:其基因会“从鱼传到番茄、从萤火虫传到烟草、从细菌传到人类”。^[8]总是有幽默的惊讶闪现。现在,“食用作物”是基因最活跃和流动性最强的领域: 但其他存在并没有落后太多。哈拉维宣称,这些实体重新定义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亲缘关系”(kinship relation)系统。^[9]在曾经泾渭分明的地方,现在出现了可疑的联系。番茄得到帮助,可以从鱼那里继承一点东西。保鲜番茄不只是一种不同于普通番茄的客体: 它属于不同的世界,在那里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外来者的入侵已经实现。事情已经不同。所有的食物过去都是基因的,但不是按它现有的方式。

哈拉维用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命名她的书,而不是用一个常规的标题,也许是给新世界贴上的又一个新标签。她正在搭建几个新世界之间的联系。一个世界是保鲜番茄以及其他存在的世界,比如我们不久就会遇到的致癌鼠(OncoMouse)。另一个是“女性

男人”(FemaleMan)产生的文化世界,“女性男人”是一本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也是旧分类正在瓦解的一个征兆。但是,让我们在那个“@”上暂停下来,然后访问网站 www.monsanto.co.uk。这是农业领域里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的主页,在这里,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一个很有用的“生物技术入门手册”(Biotech Primer)。1994 在这里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期。

1994. 欧盟第一次授权转基因植物进入市场:一种烟草类植物。

美国第一次出现商品化的转基因植物:成熟期被延迟的番茄……

向前看,我们看到……

1996. 欧盟认可了孟山都公司的抗除草剂的基因改良大豆(Roundup Ready Soya Bean)^①的进口和使用……

但是,现在当你往回看时,看看发生了什么:

数万年前,人类在大地上游荡,仅仅采集和食用他们找到的自然生长的食物。

① 农达 Ready (Roundup Ready)系列产品,孟山都生产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孟山都的农达牌除草剂。——译者



在这贫穷的自然世界和未来之间，农业时代来临了，然后出现了遗传学。面对这条“时间线”，很容易回归并捍卫贫穷而古老的“大自然”，把那些大豆看作是外来基因食品入侵的又一支先遣队。当哈拉维提出两种合成物——像保鲜番茄这样的转基因生命体和铯这样的超铀元素之间的相似关系时，还没有人像她那样提出非常引人注目的警告。然而，她同样无法抑制对“近来在鱼和番茄身上发生的事情的好奇和坦诚的愉悦”之情。并不是所有的新世界都是美丽的新世界^①。让我们再次看看这位外来者先驱吧。

① 这句的原文是“Not all worlds are brave new worlds”。“brave new world”本来出自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The Tempest)第五幕第一场中女主角米兰达(Miranda)的台词，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以之为书名创作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小说中描写了一个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然而人们却因此生活得极度不自由的社会。这本小说被介绍到我国时，书名 Brave New World 被译为《美丽的新世界》。——译者



《谨慎的 _ 见证者》不是个寻求答案的地方。它是一本关于奇怪世界和新联系的书。赛博格伦理学清楚地看到,争论双方都是致癌鼠降生时不可避免的伴随者。这些回应是这种生物带来的意义的一部分。哈拉维想获得一种新类型的伦理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承诺。

赛博格、番茄和老鼠

Cyborgs, Tomatoes and Rats



“女性男人”，哈拉维笔下的性别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现代人的象征。

赛博格、番茄 和老鼠^①

用哈拉维的话说,新的合成生命体(Synthetic organisms)是更宽泛的“赛博格”(cyborgs)世界的一部分。她是“赛博格形象”(cyborg figure)的一个长期研究者。正如哈拉维所承认的那样,虽然她并没有发明“赛博格”这个术语,但她是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发展者,并且这为她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去思考入侵而来的番茄和陌生的大豆。用科幻的话说,赛博格是一种杂合体,特别是,在其中有机成分和电子的或合成的成分被混合在一起。因此,你可能会说赛博格的一个

① 赛博格一词译自英语“cyborg”,即 cyb(ernetic)与 org(anism)的合成词,从字面上可译为“受控机”,多用来指高技术制造出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物体,因此也有人将此词译作“电子人”。但这些译法似乎都不够贴切,故本文直接采取音译。——译者

明显例子是某个心脏带着内置起搏器的人。然而，哈拉维却把这些明显的例子抛在一边。她有重要的事要做，她感兴趣的不是赛博格的特例，而是赛博格的规则。她断然声明，对于她来说，赛博格“不是关于机器和人类”(the Machine and the Human)的，因为她不把这些范畴看作一成不变的或稳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类，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番茄或者——对于物质而言——一成不变的计算机。所有实体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多端的因素影响下变化着。赛博格是这样的存在，它的出现会使其自身的范畴失去意义。一个带着鲑鱼基因的番茄使植物和动物、鱼和水果或天然的和人造的范畴都不再是原封不动的了。在格外新鲜的番茄面前，我们再也不能满怀信心地谈论这些范畴！

对于哈拉维而言，基因工程的故事完全是关于这个范畴的瓦解过程的。她认为自己的一个主要职责是去挑战业已被接受的定义和区分，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去挑战由性别造成的对世界的区分。因此，她对“我的赛博格形象”有一种职业的，同时也是私人的执著。它们在世界上的兴起宣告了所有旧概念



赛博格、番茄和老鼠

的改变。更有甚者,赛博格本身是我们自己新世界的同伴(fellow-inhabitant)。它们与我们分享了新型的“技术生物权力”(technobiopower),这种权力改变了我们居住在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在这种新体制下,时间在有些地方加速了:事物发展得更快,消息传得更迅速。然而,在另一些地方,时间却慢了下来:番茄腐烂得更缓慢,正像在它们之前铀的衰变那样。时间不再像从前,时间在变化着。

我们过去熟悉的时间在保鲜番茄这样的客体出现时发生了扭曲和动摇。哈拉维凝视着我们新生活中出现的其他时间扭曲存在(time-warping presence)的等级:“赛博格形象——例如千禧年之末的种子、芯片、基因、数据库、炸弹、胚胎、种族、大脑和生态系统……”^[10]这些形象中每一种都有着怪诞的重新安排时空顺序(re-routing time and space)的性质。新“种子”,像孟山都的基因工程大豆,其生长遵循很多新规律:更快速、更耐久、在新地方生长。“基因”为我们重新定义了未来的涵义,并且继而反过来重新定义了现在的涵义。未来越来越近地走来:对我们而言它的出现已尽在掌中。新“胚胎”正越来越快地遵循我们命令

的节奏，并且我们解读它们秘密的能力越来越强，甚至能复写它们。新“炸弹”像我们一样聪明。“生态系统”已经上升为一个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毁灭它的存在：出现了一个受到威胁的未来。“数据库”是一种新实体，一种由信息构成的存在——与基因的形象类似。

基因工程食品自身是这些赛博格形象的后裔：种子、基因、数据库。它因此是其他此类后裔的近亲。其中，哈拉维特别挑出来一种小啮齿动物：致癌鼠，一种经过基因上的重新设计而生长癌细胞的实验室老鼠。它因此是为癌症研究的一种定制的(customised)工具，并且，正如哈拉维指出的，它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它的受难可能包含着我们解救的希望。致癌鼠像保鲜番茄或铯一样使时间发生了变更。它未来的痛苦像保鲜番茄拒绝腐烂一样是被严格编码的。在这些存在面前，各种范畴模糊了：现在和未来、机遇和宿命、自然和文化。我们制造了它们，而且我们现在正寓居在它们形成于其中的新时空里。

像保鲜番茄一样，致癌鼠是一种首次出现的东西。它拥有自己的专利，由哈佛大学持有，杜邦



(DuPont)^① 则持有经营权。在致癌鼠面前,我们无法使用我们过去惯用的法律和自然范畴。就像哈拉维所说,致癌鼠的“自然栖息地”是实验室,它的社会环境则是贩卖它的公司以及制定规则和提供金钱的政府。在旧的外来者传奇中,问题是说出一名外来者何时会出现在你面前。它们会发出一种奇怪的振动,一些人可能幸运地感觉到它们。当你感到一个新世界在你周围逐渐形成时,你能说出一个赛博格形象出现在你面前。在致癌鼠的例子中,这个世界是“公司生物学的世界”,它的范围从基因到公司股份,从养殖中心到医院。我们与致癌鼠分享未来:癌症的前景和治愈的可能性。

当致癌鼠出现的时候,其专利申请遭到了动物权利组织的反对,他们论辩说,设计一个存在去遭受苦难,这是对生命的践踏。科学家们回应说,这种痛苦是减轻我们和我们孩子痛苦的最佳希望。《谨慎的 _ 见证者》不是个寻求答案的地方。它是一本关于奇怪世界和新联系的书。赛博格伦理学清楚地看到,争论双方都是致癌鼠降生时不可避免的伴随者。这些回应是

① 美国著名化工公司——译者

这种生物带来的意义的一部分。哈拉维想获得一种新类型的伦理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承诺。她从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一部小说中取得了女性男人©这个形象，性别的旧范畴在这个形象的身上成了多余的东西，就像旧的自然和文化范畴在致癌鼠™身上成为多余的东西一样。哈拉维于是代表女性男人©、相会的杂种、时间扭曲者以及新世纪受害人的支持者宣称：“致癌鼠是我的兄弟姐妹，无论雄性或雌性，她/他是我的姐妹。”^[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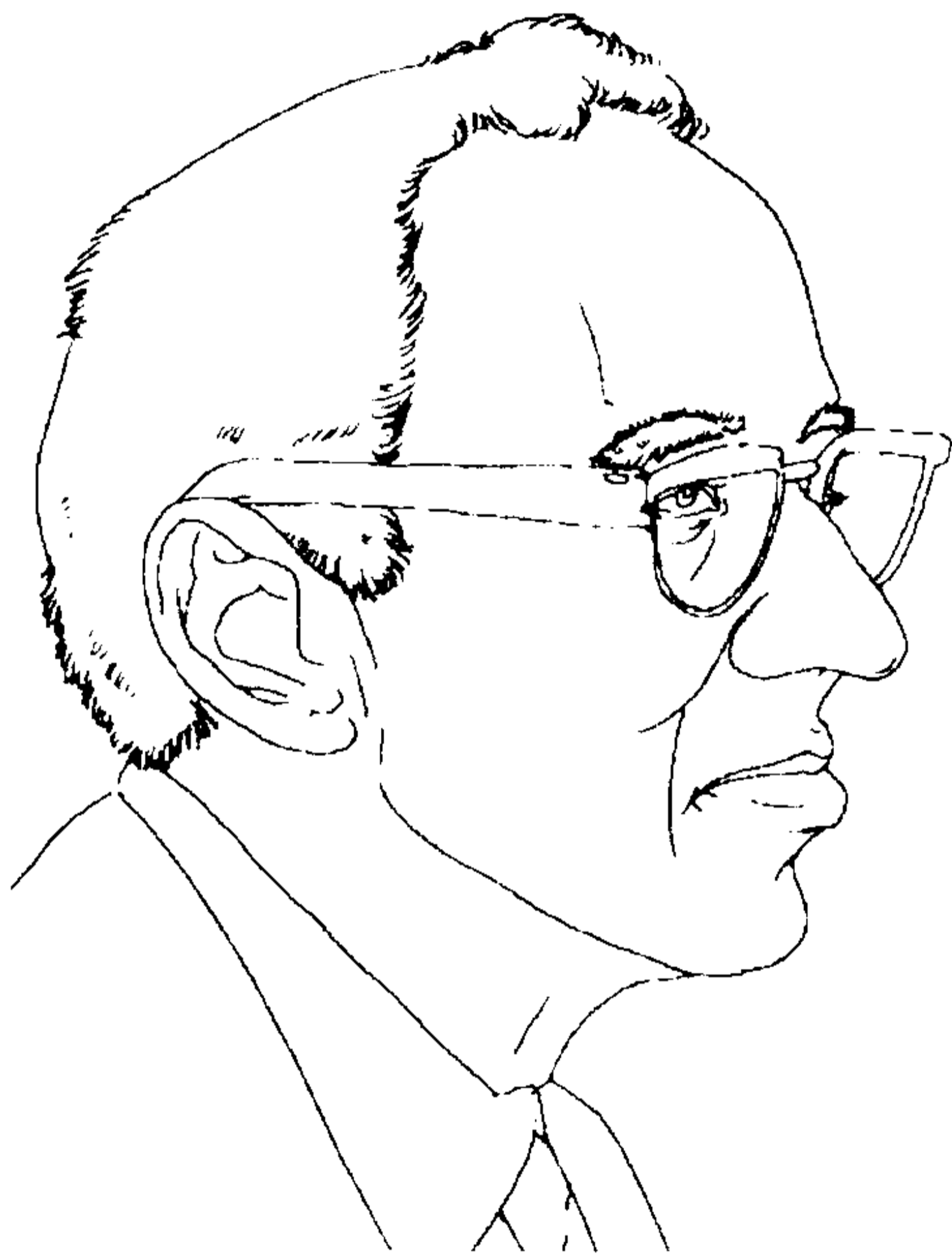
如你可能会说的那样，哈拉维的书本身就是一个赛博格：研究报告和信仰声明、历史和预言、学术分析和诗化的想象的结合体。她所做的既不是否定也不是支持那些新事物。但她也不仅仅是做报道。她的目标是与保鲜番茄和致癌鼠分享这个世界。她的故事是对旧外来者故事的颠倒——这个故事全都是关于认识这个新家庭的，在这个被拓展的家庭里，我们都重生为赛博格公民。核家族的纪元也许正在过去，转基因家族正在到来，既有新的姐妹对手，又有新的兄弟之情。



在对增长和利润的追逐中,超级资本主义没有留下任何未经改变的东西。所有客体突然间都有了改变的潜力而不用给我们任何通知。番茄、老鼠、人体、病毒、细胞、数据库:各种东西联手来,相遇、寒暄,并伴着超级资本主义的乐章一起跳舞。

www.hypercapitalism.com

W www.hypercapitalism.com



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哲学家。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讲授科学史。他是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中的重要代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引发了科学哲学的“革命”。

www.hypercapital-
ism.com^①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Donna Haraway and G. M. Tootle

又有七种基因工程食品是安全的

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完成……对另外七种基因改造(genetically altered)植物的审查……

——又有三种番茄……

——一种经过基因改造自然抵抗两种致命病毒的南瓜……

——一种自然抵抗科罗拉多马铃薯虫的马铃薯…

…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美联社, 1994年11月2日

① 单词“hypercapitalism”可译为“超资本主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现阶段状态的描述，一般被认为以知识经济、全球化等为特征。——译者

资本主义生产了物品,并且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也生产了一个世界和其中的生命。现在,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在这些物品身上,因此可以断定,资本主义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转向。新的物品正瀑布般倾泻到我们当中。保鲜番茄之后仅仅数月,又来了超级番茄、抗病毒南瓜和新土豆。这则报道的关键词是“自然”。这些物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自然”地存在着,更别说拥有广告上说的那些新力量了?在传统意义上,这些东西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非自然的:它们超越了自然和非自然。这就是为什么,用哈拉维的话说,“这些技术科学子宫中的后裔是赛博格”。我们在这里拥有的已不再是批量生产属于我们而不属于自然的物品。相反的,我们拥有新的有机体制的开端,这个体制被恩赐了不可思议的生殖力,正诞生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成为“自然的”。我们不是在生产物品,相反,我们正在重新创造诞生的过程。这是一种新的自然(new nature),而不是非自然(non-nature)或反自然(anti-nature)。

哈拉维又补充说,这些赛博格在他们自身内携



带有“被密集包裹的浓缩世界”(densely packed condensations of worlds)。例如,在那种马铃薯里,就包含有潜在的旧的瘟疫变为无害的世界,以往致命的东西现在只是小事一桩。如果这个世界完全形成,那么科罗拉多甲虫将会变成一种消失了的秩序的象征。那种南瓜可能实现一个病毒在其中是无害的世界,“致死”因子被永远从中排除。很清楚,这些可能性所触及的已经远远超越了马铃薯的虫害和南瓜的腐烂:我们看到了远方的地平线,在那里,其他瘟疫和致死病毒都是无害的。

比尔·盖茨 (Bill Gates) 和保罗·艾伦 (Paul Allen), 共同创立微软 (Microsoft) 的亿万富翁, 在一家新的生物制药公司投资了 1 千万美元。这家总部设在西雅图的“达尔文分子公司”(Darwin Molecular Corp.) 声称, 公司计划通过对 DNA 的计算机分析, 开发治疗艾滋病、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方法。

《华盛顿邮报》, 1994 年 5 月 7 日

你可以看出为什么哈拉维以一个电子邮件地址的方式展现她的基因视野。DNA 成为信息万维网上

的另一个网络。那家新公司,即达尔文分子公司,本身就是一个赛博格,这个混血儿一经出现,DNA和IT就失去它们原有的含义。编制这张网的是“共同创立微软的亿万富翁”——是他们的许可使这段文本得以写成。致癌鼠和保鲜番茄在这个连接着世界的网络里非常安适自在,生命和信息在其中经历了宏大的合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治疗艾滋病、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方法”:另一条瀑布向我们倾泻而下,一条将要治愈一切的信息存在的瀑布。没有这些疾病,健康和福祉将加入多余范畴的冗长名单之中。在旧有的苦难已经消失的世界上,健康或者不再有意义,或者有了新的意义。我们的身体,像其他客体一样,将逃离我们看待它们的旧有范畴。达尔文分子公司像基因和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包裹着等待降生的世界的赛博格。

在财经专栏和我们的生活中,新的事物如洪水一般不断加速涌来。哈拉维将这一过程称为“超级资本主义的市场交通”(hypercapitalist market traffic),并且有时交通流量面临阻塞的危险。资本主义已经到



了超级时代：更快、更怪、更奢侈、更虚幻。这是新千年面临的真正的交通问题。在它的增长和利润的追逐中，超级资本主义没有留下任何未经改变的东西。所有客体突然间都有了改变的潜力而不用给我们任何通知。番茄、老鼠、人体、病毒、细胞、数据库：各种东西联起手来，相遇、寒暄，并伴着超级资本主义的乐章一起跳舞。

然而，从这个观点看，地球本身恰恰是另外一个客体。为什么这个客体就该与众不同呢？根据哈拉维以及与她意见一致的贝克(Back)、吉登斯(Giddens)和卡斯特尔(Castells)的社会理论的观点，旧的地球正在逝去，新的地球正在降生。我们正在见证“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 of the world)。保鲜番茄已经被改造以超越各种局域性特质。类似的，致癌鼠也是普遍性的需求。这些存在向整个地球致辞：它们是为那个目的被制造出来的。当网络四通八达，当旧地球变成新的全球系统，混合体的时代就来临了——番茄和实验室老鼠将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先知，也可能成为同伴受害者(fellow-victims)。

这个生命市场是不稳定的地方。每个存在都潜

在地与其他存在联系在一起，并且每个新的链接都使它的世界得到更新。退一步看，哈拉维把这颗全球化行星放入新的“技术科学的行星空间”(technoscientific planetary space)之中，这颗行星与其说是被月球环绕着，倒不如说是被通讯卫星环绕着。如果你想弄明白这颗新行星是什么样子，你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食物链追踪放射性同位素”。^[12]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新实体落入的相互联系的网络是多么得复杂。难怪那些日子的财经新闻全都是关于合并的。确实，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前一个星期，与哈拉维相呼应，时代华纳(Time Warner)和美国在线(AOL)合并，创造了最大的一个赛博格——旧—新(old-new)媒体—互联网公司(media-Internet company)、传统的先锋派杂种、带有低级滑稽表演基因的电影公司、带有电影基因的图书出版公司。(后来，在我回头看这些文本时，它们又与EMI合并。自1994年以来，事情看来变得越来越快。)

把细菌基因嵌入番茄在蔬菜市场上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在国际经济上它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保鲜番茄和致癌鼠是新的全球化地球的首批完全自然



化的公民。它们是“跨国企业文化”的合法公民，哈拉维称此文化为“新世界秩序公司”。核物理学是支持冷战世界的科学，转基因学则是支持新世界秩序的科学。^[13]

www.hypercapitalism.com



哈拉维想让我们从一些最有影响的反对基因改良食品、基因改良作物和基因改良生命体的论点退却。如果你仍要去反对，那么你需要看看别的地方，而不是“类型的教条和内在目的”。从来没有一个自然，其中的所有范畴都是纯粹的，并且不可能有一种内在的论证去反对包含了“跨越边界”或超越界限的现象。如果新存在和它们的赞助者有什么错误，那么出错的不是它们的混合本性。

不纯洁的殿堂

Impurity Hall



现代人与现代科技的关系变得日趋复杂。哈拉维对赛博格、基因改良食品等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深入这些问题的核心。

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Donna Haraway and G.M.O. Food

不纯洁的殿堂

哈拉维不是在庆贺超级资本主义的开始。相反，她看到权力正转移得离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更为遥远。然而，她对从技术科学子宫里诞生的新存在感到同情 (sympathy)，甚至是移情 (empathy)。《谨慎的 _ 见证者》最感人的方面就是肯定与其他所有非标准 (non-standard) 存在的亲缘关系。因此，如果你透过哈拉维的眼睛去看，或者透过她的角色比如致癌鼠和女性男人的眼睛去看，那么，在读到保鲜番茄命运的时候，你会百感交集：

……来自纯粹食物运动 (Pure Food Campaign)
的激进主义者将抵制那种番茄……

华盛顿邮报，1994 年 5 月 21 日

哈拉维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并且她对所有反对全球化势力的行动主义者本能地抱着同情态度。然而，她的作品也建议，对任何希望回归到失去的纯粹状态的要求持保留态度。她的杂合声音引人质问：保鲜番茄因为它是不纯洁的就是坏的吗？

这就是堂娜·哈拉维遭遇基因食品时的苦恼的心情，这是关于纯粹性和不纯粹性的问题：

基因改良作物：基因污染被证实

地球之友通讯发布，

www.foe.org.uk, 1999年9月29日下午10:30

人们即刻关心的是基因改良玉米的野外试验和关系外来花粉扩散的“基因污染”。但是，“基因污染”(genetic pollution)一词还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义，无论使用它的人们的美好意图是什么。在其他地方，土地协会(Soil Association)，代表有机农业(organic farming)的声音，基于“交叉感染”(cross-contamination)的理由反对进行同样的试验(简报，1999年6月，www.Soilassociation.org)，并且主张销毁基因改良的试验作



物；绿色和平组织的梅尔切勋爵(Lord Melchett)提到了要“解除感染”。在这场争论的另一边,我们发现了“生物工程师”(bio-engineers):

生物工程师发现了一种“限制”

超级植物的方法

奥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项技术,他们说,这项技术将打消人们对基因改良植物向周围扩散它们基因的恐惧。

www.CNN.com, 1998年4月23日

《谨慎的 _ 见证者》的主导论调相比之下更接近绿色和平组织而不是孟山都。确实,哈拉维非常犀利地讥讽了一本由孟山都资助的生物学课本,在这本伪装成科学教育的书中,可以看出对既得利益的一些拙劣辩护。可是,当认识到在超级资本主义中运行的那股可怕力量时,哈拉维在反基因食品争论的核心处退缩了,而这一点可能正是这场争论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之处。

在大多数抗议中,新的基因改良食品和食用作物

看起来是不纯净的。它们是非法的杂种。像“基因污染”这样的短语在这些争论中不可避免地要被人们反复使用。问题不在于那些行动主义者们的意图或这场运动直接的矛头所指。问题在于这种语言阴魂不散。在濒于灭绝的纯洁性和基因污染的隐喻中，到处是鬼怪或恶魔。这些精灵毫不介意行动主义者们的目标和手段——它们只是在这些用词中变得栩栩如生。

《谨慎的 _ 见证者》总是在搜罗有关杂种的、非法的和无法归类的存在的观点。从那种观点出发，你可以看出，在最令人敬慕的运动中“被种族纯洁性迷住”的古老的西方恶魔在起着作用。这里是最困难的见证行动。以世界上所有外来的、不纯洁的、无法归类的东西的名义，哈拉维把她很多观点全部托付给一个纪念行为：

在这种语境下，忘记对血统污染的焦虑正是欧洲文化中种族主义说教的根源，这是错误的。

哈拉维总是本能地同活动主义者站在一起。她的论证不是说活动主义者是无意识的种族主义者，而是说在那种语言里寄居有其他声音的鬼怪——这



个时代保留下来的古老的和未死的种族主义的恶魔。从赛博格、杂种的角度看，像“基因污染”这样的语言不可能永远对它的过去一无所知，不管眼前的意图是善良的还是进步的，这种语言要经常冒诉诸类似的古老反应的风险。

在生物技术的讨论中，我禁不住听到无意中发出的对外来者恐惧和对杂种怀疑的论调。

哈拉维的论证毫不妥协，书中的每样东西——它的写作方式和它发出的信息——都贡献给了这一刻。在第二个千禧年结束之际，你不可能利用自然的“种类和纯洁性”的逻辑而不涉足阴魂出没的地方。

就遗传学和食品的发展而言，《谨慎的 _ 见证者》含有混合的信息。这项技术凭着它的全球化趋势和勃勃雄心是不可能与超级资本主义分开的。但是，生物技术与这种经济体系并不等同，有更多东西在起作用，而不仅仅是工具的使用。特别的，哈拉维想让我们从一些最有影响的反对基因改良食品、基因改良作物和基因改良生命体的论点退却。如果你仍要去反对，那么你需要看看别的地方，而不是“类型的

教条和内在目的”。从来没有一个自然,其中的所有范畴都是纯粹的,并且不可能有一种内在的论证去反对包含了“跨越边界”(border-crossing)或超越界限的现象。如果新存在和它们的赞助者有什么错误,那么出错的不是它们的混合本性。你真的能够相信(问问见证者的看法),20世纪之后,辩论反对“植入外来基因”,福祉就会来临?把这些隐喻的影响限制在它们被移植人的领域真的是可能的吗? [14]

哈拉维回忆1938年,当杜邦首次开始进行尼龙的商业制造时,这项工作设在一座被称为纯洁殿堂(Purity Hall)的新实验室里。人们可以设想,新的转基因科学最好设在“不纯洁的殿堂”(Impurity Hall)。这种科学将孕育其他人可能斥之为“不和谐杂交”的东西。新科学将沉迷于“外来基因”,这将威胁到那些认为世界原本是纯洁的人们。“不纯洁的殿堂”将成为资本主义向着超级方向发展的一个中心,恰如“纯洁的殿堂”是较早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一样。这不是任何简单意义的解放能从中流向世界各国的地方。

无论这项科学的利用和所有权中包含有多少危



险,这项科学仍然有积极的潜能。这项新的“技术科学”本身将永远是纯粹与应用、商业与神秘、实践和理论的混合。当新生物学开始它榨取利润的生意的时候,它将也是“混合所有参与者”的中介。紧随生物技术科学之后,“种族纯洁性”的伪科学基础最终将彻底声名狼藉。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自己是一个萌生模糊性的地方。纯粹范畴的理想最终可能被击败,胜利的英雄将包括“一种杂种老鼠”,作为它的朋友和亲戚的所有打着交叉补丁(cross-patched)的人类,以及他们永无休止的杂种后裔。^[15]

亲爱的读者,你觉得这个世界颠倒了吗?记住,这位假想中的谨慎的见证者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一个感觉被拖向外来者的人。这个论证通常不是另一种方法吗?——新的基因学和旧的所谓人口控制和操纵的科学有着可怕的联系,这种科学曾被称为“优生学”(eugenics)。它难道不属于种族纯化主义阵营的基因控制者吗?他们会不会抱有通过基因重组(genetic reprogramming)根除“退化者”的旧的梦想?《谨慎的_见证者》举证反对下列主张:在转基因生物中,她/他发现,所有不健全的、杂种的、不规则的

都是盟友,而且她/他还补充了活跃的、充满多样性的惊异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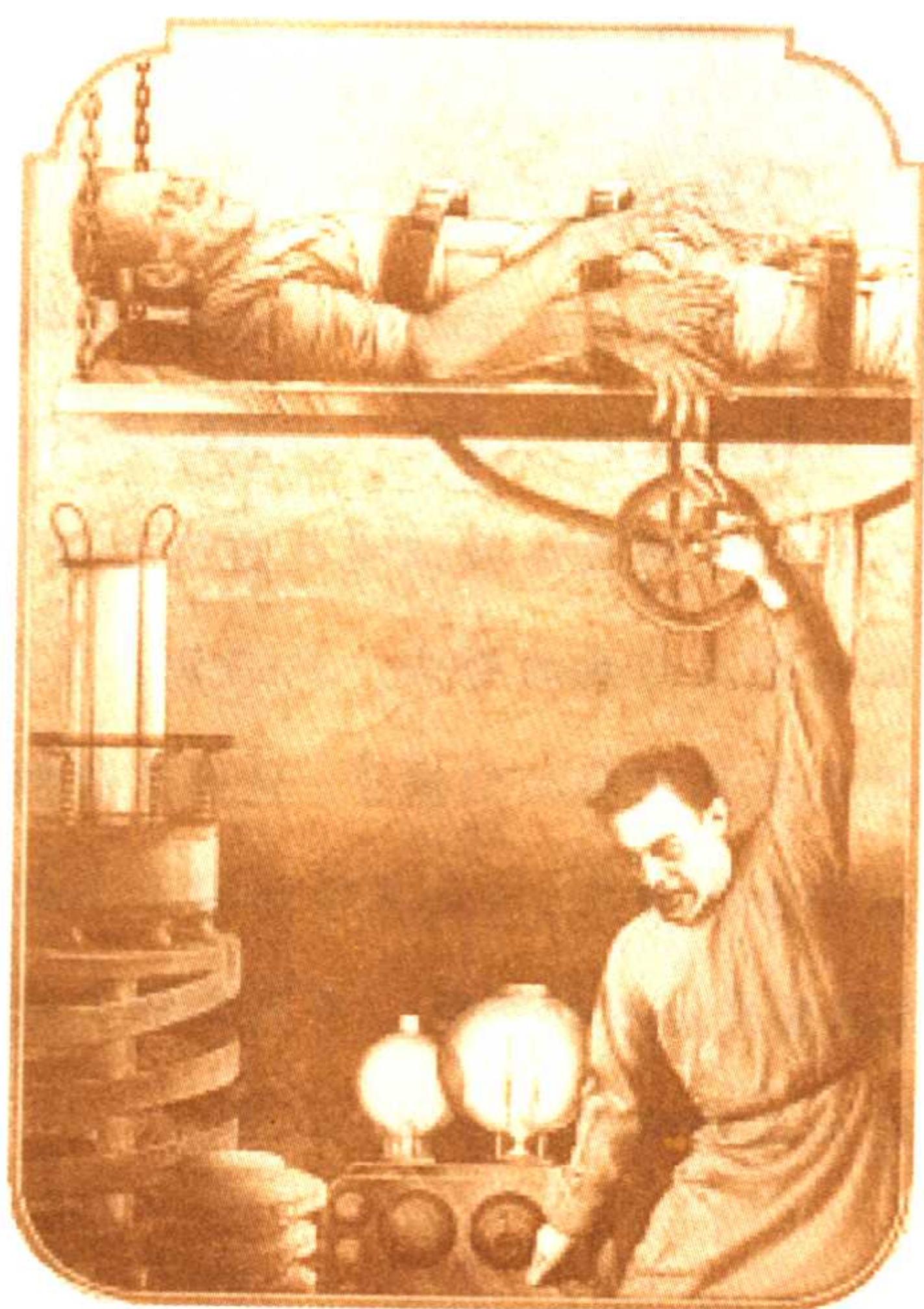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位证人吧……



在第二个千禧年之末的某个地方,我们停止了对那些旧的见证者的信任。嘲讽的解释是,他们给了人们太多的最终被证明是虚假的保证,或最终被证明是没必要的警告。我们放弃了黄油,结果发现它被再度向我们推荐。我们被告知英国牛肉可以安全地食用,接着房顶就塌了下来。但是,哈拉维有更深刻的解释。事实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已经改变了它们的自然。

让谨慎的见证者变异

*M*utating the Modest Witness



弗兰肯斯坦博士在制造怪物。

让谨慎的见证者 变异

科学观念总是在科学内外引起争论。不过,像哈拉维那样从第二个千禧年往回看,科学在人们对其所触及的任何事情都不敢苟同的世界里,一直有相当成功的办法获得“可靠的证人”。考虑到我们如何善于采纳彼此的争议,科学总是拥有真正“令人惊异的力量”(stunning power),而这个力量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所关心的很多问题上“确立事实”的能力。在宗教和政治中,异议处于主导地位,而事实永远被怀疑。事实为政治家、宗教领袖和道德门派之间的争论添油加醋。让我们听听新闻辩论。一派认为事实显示经济正在增长,然而,紧接着,另外的事实激流就倾泻在另一派。我们发现这是很自然的:它是我们的家,这个充满争

议的世界。然而,上个千年的最后一个世纪,科学一直是不同的。在科学已经建立的那些社会中,人们已习惯于认为,科学事实(scientific facts)是不同于一般事实(ordinary facts)的。当然,到底什么算科学,总有争论的空间,并且,从来也没有缺少过持不同见解的科学家。然而,还是有连串的令人惊奇的事实被保留了下来,就像在我们争论的汹涌大海中的连串岛屿一样。这些事实是关于各种主题的,这些主题我们不可能检查甚至质疑它们。我们采纳了关于宇宙诞生或物质本性的事实,采纳了关于物种起源或人性发展的事实,也采纳了关于神经系统或声音属性的事实。

科学在论辩的世界里使事实变得可信。哈拉维通过创造一个被称作“谨慎的见证者”的角色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个见证者以科学的声音说话,并且,如果他在权威法庭上发表关于事实的声明,他(因为它一直是主导的“他”)将被相信。哈拉维着迷于这种清晰的权威。这位谨慎的见证者看起来好像是代表“客观世界”(the object world)说话。而其他每个人都是主观的,并且他们说的话都源自他们的观点。然而,谨慎的见证者除外。用他的话说,我们听见了客体在说



话,无论它们是石头还是神经元。谨慎的见证者能够保证“客体的清晰性和纯洁性”(the clarity and purity of object)。多亏这个声音,我们知道了事物是什么以及它们不是什么。^[16]

新的技术科学则不同。它对客体的纯洁性提出挑战。在保鲜番茄之后,“番茄”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范畴,并且即使拿掉商标也不会改变结果。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事物总是模糊的——它们在我们背后重叠起来,它们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联系起来。我们刚刚开始在这这么多的联盟面前醒来。自然不再代表纯洁性。然而,在什么情况下,这些客体将被见证呢?很清楚的,那位古老的谨慎的见证者将不代表他们发言。

以黑脉金斑蝶为例。1999年,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研究认为,改良玉米的花粉对深受人们喜爱的黑脉金斑蝶幼虫是有毒的。“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援引这一点以便引起克林顿总统的关注:

……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的令人惊异的新研究……发现,近一半喂食了用苏云金芽胞杆

菌(Bt.)改良的玉米花粉的黑脉金斑蝶幼虫会在四天后死亡……

www.foe.org, 1999年6月14日

当然,即使是“科学家”这样宣布,事实总是存在争议。但是,这些争议有不同的地方。在英国,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问,我们是否真的了解了这些怪兽作物(monster crops)。德里克·伯克(Dereck Burke)教授在答复时,刻薄地评论道:

那项被广泛宣扬的关于黑脉金斑蝶的实验显示,在实验室条件下被强行喂食了玉米花粉的幼虫受到了损害……

《反馈杂志》,1999年6月14日

在这里“科学”和“媒体”间没有距离。科学的见证已经失去了它相对于对基因改良还有争议的政治或宗教的独立性。在这里没人把科学家看作是独立的证人,确实,那不是这种科学的目的。在这里,科学成了争论的一个向度。这些主张不是一开始作为中立科学然后卷入政治、宗教和伦理的争论中的。不,它们首先是科学据以激起这些争论的主张。在这个新世界,科学和争论像鲑鱼和番茄一样被牢固地拼



接在一起。

然而,这本书又是从何讲起的呢?哈拉维很早就把她的书置于“被污染的实践”(contaminated practice)上。^[17] 要《谨慎的 _ 见证者》客观地谈论纯粹客观性的消逝或中立地谈论科学中立性的逐渐过时是没有意义的。哈拉维的书是从它所诠释的世界中的一个网址说起的。因为那个世界在你所到之处都是不纯洁的,因此,那里的文本就不可能是纯洁的岛屿。什么是“污染”?在关于基因改良花粉的争论中,行动主义者提到了外来基因对环境的“污染”。哈拉维的词句接受了它们自身的污染。它们没有一处是纯洁的。例如,这是一部依托于人类学、文化研究和科学社会学文献的社会科学作品。然而,在它的形式、风格以及最重要的,它的思想上,它也是一部幻想作品。书中的句子从命题开始,然后转变成隐喻性的幻境,然后又展开产生论证。

老式的谨慎见证者旨在通过清晰的存在或观察说服别人。“它们就是事实;它们为它们自己说话。”然而哈拉维处理的不是一个此类事实频繁发生的世界。它们至少是一个濒危物种。事实在论证中已经成

为有争议的断言,双方的立场正是议题所在。那么,究竟谁在代表科学说话呢?

哈拉维的文本并不仅仅是谈论理念的。实际上,哈拉维的词语好像来自这些理念,它们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例如,哈拉维给予致癌鼠——“被精心剪裁过的实验室啮齿动物”——看似客观的一个说明。但是不久她又来了个180度转弯,宣称这种啮齿动物“变异的眼睛”是她观点的来源。这个文本的目标是把它的句子放在它所分析的理念和存在的视角里面。这是下断言的时刻,“我采用女性男人作为我的替身”,女性男人和致癌鼠都生活在“内部破裂之后”(after the implosion),其中,客观和主观、事实(fact)和隐喻彼此融合。哈拉维不是说没有事实。相反,这本书里充满了非真即假的关于生物学、关于人口、关于疾病和健康的信息的陈述。然而,这里没有“纯粹的”事实:它们携带着关于自身的争议,它们总是处在争议的领域。如果没有争论,没有人会费心去收集这个信息,并声称这就是事实。

我们的这本导读由它所诠释的生物形象组成:抗虫蛀马铃薯、易致癌老鼠和超级南瓜。如果把你引



向这样一个怪诞世界的向导听上去亲切而又直率，你愿意信任他/她吗？有些时刻，作者或她的声音好像被这个世界所控制。在内省中，作者哈拉维发现奇怪的东西正发生在她自己的词句中，“叙述性的时空景象在我句子的肉体中繁殖”，过去被拼接到未来上，进步的故事被拼接到灾难的寓言上。^[18]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该信任谁？这个问题远远超过了从基因食品到环境污染、健康危机和风险等诸多问题之上。我们处在一个信任本身都成了主要的争论议题的阶段。关于基因食品的争论是这一更普遍趋势的有力的实例。问题是要决定该相信哪种声音。哈拉维不是在告诉你该相信什么。但她在建议你重新考虑你相信哪种见证。

女性男人和致癌鼠最终成为变化着的世界的事实上的谨慎见证者……

你最好开始信任那些模糊的东西，即那些不能被定义的声音。如果你想理解这些新事实，那么试着从那只易于癌变的救世主老鼠的视角去想象它们吧。找出最模糊的观点，然后从那里重新审视这些事实。实际上，哈拉维宣称，那些新的遗传事实不只是

更多的信息。它们代表着整个信息世界的变化。事实已不再是它们过去的样子了。当然,这些理念本身就是模糊的!但它们所包含的一个意思是,这些事实是与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拼接在一起的。这些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事实。它们包含着可能性(possibilities),包含着对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不可能发生的所有可能性。

让我们想一想保鲜番茄、基因改良玉米和防虫害马铃薯,问问它们:你安全吗?答案的形式是概率性的陈述,包括来自其他食品——像“正常的”汉堡或土豆片或巧克力的伤害的可能性。此外,关于基因食品的事实是渗透性的事实,它们被理论渗透着。你不能把关于保鲜番茄的基本理论与关于DNA或关于进化本身的复杂理论分离开。哈拉维将这样的资料称为“世界在变化着的事实”:这些是特定世界中的事实。^[19]换言之,接受南瓜现在可以“天然”抵抗腐烂的“事实”包含着进入某个特定世界,而抛开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新世界中,有新的事实。但如果你停留在旧世界中,这些新事实就不像是“事实”。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是不正确的,另一些人是错误的。但



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决策的方法。

哈拉维是怀着一个目的写作的，在小说家可以有道德目的的意义，甚至可以将它称为道德目的：“我想要一个变异的(mutated)谨慎的见证者。”旧的谨慎的见证者很可能是些专家。他们客观地谈论着产生清晰结果的实验。他们根据被强有力的专家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理论谈论他们的论证。在第二个千禧年之末的某个地方，我们停止了对那些旧的见证者的信任。嘲讽的解释是，他们给了人们太多的最终被证明是虚假的保证，或最终被证明是没必要的警告。我们放弃了黄油，结果发现它被再度向我们推荐。我们被告知英国牛肉可以安全地食用，接着房顶就塌了下来。但是，哈拉维有更深刻的解释。事实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已经改变了它们的自然。关于保鲜番茄的事实和关于橡树、橡皮或月亮的事实已不再是相同种类的事实。它反倒是同关于黑洞或编程“语言”有更多的相同点。这些是“变异”的事实——充满了理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你必须像频繁地使用计算器一样使用你的想象力来抓住这些新事实。



你不再能够说学术中心在哪里止步，商业组织在哪里起步；你也不能确定美国在哪里止步，瑞士在哪里起步。更微妙的是，你不能确定制药学在哪里止步，遗传学在哪里起步。大学曾经是一个边界森严的系统——不论是在学科之间，还是在学院与各种外部世界之间，都是如此。确实，这里曾经有过很多神秘的交叉，但现在到了一个新时代，边界控制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在这些“学术中心”上面飘出一面写着箴言的旗帜：欢迎来到交叉世界！

变异的大学

*M*utant Universities



致癌鼠 (OncoMouse), 美国哈佛大学研制出的供医学研究用的小白鼠, 它经过基因上的重新设计而生长癌细胞。它未来的痛苦是被严格编码的。

变异的大学

一篇关于基因和食品的科学文章是一种形式的知识，或是一种可能的知识。报纸上的文章也是如此，只是方式不同。但是，保鲜番茄也是一种形式的知识，而不只是世界上的另类存在。同样，一本关于癌症的书旨在被人们接受为知识。一则新闻消息，目的在于传播或质疑那些知识。然而，致癌鼠是一种形式的知识，同时也是获取更深入信息的一种手段。知识可以表现为词句的形式，或客体的形式，而现在，知识表现为有生命的存在的形式。

大学在努力生产知识，大多数是以文本的形式。但是，她们也生产新的有生命的知识，即信息有机体 (information-organism)。让我们再次传唤致癌鼠，这一

次是为了见证她的创造者的本性。

变异老鼠在欧洲的判例案件

由哈佛大学养殖的变异老鼠结果变成一个判例案件(test case)……

美联社,1993年1月21日

这则新闻涉及的是为了保护致癌鼠的最初发明者——哈佛大学的专利权而在欧洲遇到的法律争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哈佛大学在美国已经获得了专利:

致癌鼠的美国专利是在1988年授予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给一种人工设计的自然生命形式授予专利。

这种造物看起来令人惊慌,因为它打破了所有界限:人工的(artificial)和自然的(natural)、设计的和生命的。然而这则新闻报道也强调它的所有权也是混合的:

杜邦·德·内穆尔和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 Delaware)的生物公司(Bio, Inc.)拥有它的商业权。



这种老鼠是一个学术产品,也是一个商业用品;它是一种研究工具,同时也是销售目录上的一栏;它是治愈疾病的希望,也是获得利润的曙光。所有这些范畴一起变动,大学本身就是其中之一。在生产致癌鼠的过程中,哈佛也重塑了自身。致癌鼠的出现证明了哈佛和它的近亲们的某些根本的东西:它们也有新的家族系统。

如果知识在变化,那么你应该预料到学习和研究的机构也会变化。哈佛与杜邦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杜邦公司先是在塑料革命中处于中心,随后又在原子时代举足轻重。这种结合是对新的基因发明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结合在一起的机构创造了一个此类发明得以产生的混合世界。致癌鼠的自然栖息地就是哈佛与杜邦融合的地方。其他基因创新产品将会栖息在一个更加模糊的世界:

坐落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千禧年公司 (Millennium)^①的研究人员,正与坐落在瑞士的霍夫曼—拉·罗什公司 (Hoffman-La Roche)^①及其

^① 千禧年制药有限公司 (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 Inc.), 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译者

他的制药实验室和学术中心合作，寻找感受器基因(receptor gene)……

美联社,1995年12月29日

你不再能够说学术中心在哪里止步，商业组织在哪里起步；你也不能确定美国在哪里止步，瑞士在哪里起步。更微妙的是，你不能确定制药学在哪里止步，遗传学在哪里起步。大学曾经是一个边界森严的系统——不论是在学科之间，还是在学院与各种外部世界之间，都是如此。确实，这里曾经有过很多神秘的交叉，但现在到了一个新时代，边界控制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在这些“学术中心”上面飘出一面写着箴言的旗帜：欢迎来到交叉世界！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们从总体上看到哈拉维对她自己写作和交流中的模糊性所进行的探索。她也同样关注于创造知识的这些机构或网络。比如，她把哈佛与杜邦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相互联系追踪到1970年代后期，并且把这种联系看作是“工业与学术界共生的一个标志(trademark)”。^[2]“标志”(或“商标”)属于经济世界，共生是自然的一部分。又一次地，范畴与

① Hoffman-La Roche 公司，著名的瑞士制药商。——译者



范畴之间彼此交融。所以,再一次,“基因拼接的基本技术”由一项被拼接的专利——斯坦利-科恩—赫伯特—波义尔专利 (the Stanley-Cohen-Herbert-Boyer Patent)所涵括。专利权跨越两所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并且还加上了工业界的利益。哈拉维试图展现的是一个行动中的世界的逻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独特的和分立的。存在就是具有与其他实体发生联系、被其他实体吸收或被重合或被重新定义潜力。在这个方面,大学与番茄没有区别:它没有清晰的界限,而是存在于与其他实体的关系中。对大学而言,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分,就像南瓜没有这样的区分一样。

哈拉维再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些重叠与合并看上去像是另一种腐化(corruption)。我们不正在失去我们“纯洁”的学问机构吗?作为致癌鼠的近亲,异种鲽鱼的倾慕者,哈拉维没时间为此忧郁。基于几个理由,她公开指责了对“纯研究的‘怀旧病’”。一方面,知识从来不是纯洁的,它只是试图显得纯洁。另一方面,交叉的思想从根本上是创造性的。作为一个例子,她提到“计算机科学和分子生物学之间的复杂联系”,

通过这种联系,新遗传学得以发展。说实话,在“生物学的公司化”(corporatization of biology)中有很多事情令人担忧,用它作为对大学与工业“共生现象”的描述是不太愉快的方式。严重的危险是对“社会批评”的威胁。依赖于这些巨型伙伴关系的大学仍将是同一经济系统的批评者的家园吗?丢失的不是纯洁性,而是批评,批评本身成了一种混合的行动,一部分是理智的(intellect),一部分是感情的(emotion),一部分是超然的,一部分是投入的。^[21]

这本书的网址详细指明了一个时间: @ 第二个千禧年。千禧年之交本身就是一个交叉的时间概念,不同的纪元在这里结合起来,记忆和预言也在这里融合。在那一时刻,大学也发生了变异,而且哈拉维和它一起变,因为她是从这样的一种变异来写作的。在厌恶、怒火和希望的阴影下,她从这个变化了的机构的内部寻求见证,并且这也是她为什么对基因新浪潮付出如此多的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产品自身携带着我们学术机构的形态:结合、不协调和潜在的创造性。我们倾向于认为知识是寻求发现关于我们世界的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哈拉维来



说,新的知识是由“生产世界的实践”组成的。这就是说,知识现在仅仅抓住这个世界并重造它。在18世纪,第一批植物科学家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在千禧之交,它们的杂种后裔正在重新混淆各种范畴。你可以说新的联系正在被揭示,或者新的链接正被建立,或者真实的界限正在被摧毁。当鳔鱼被用来拯救腐烂中的番茄的时候,大自然是在交出她真正的秘密吗?用哈拉维的话说,答案是“是又不是”(yes and no):在我们寻求理解自然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帮着从自然内部重塑自然。

哈拉维采取的原则是:“任何事物都来自它自身的世界。”在保鲜番茄或基因改良大豆的案例中,那个世界包括第二个千禧年变异的大学。是那个世界创造了这些存在,还是这些存在创造了那个世界?这里没有清晰的答案。没有这个新世界,就没有新存在,而没有新存在,也就没有新世界。哈拉维含糊地谈到“制造知识”(forging knowledges):谁还能确切地说出知识何时是真的?整个冷战时期,社会理论家谈论的是“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现在,哈拉维建议,我们也可以谈论学术—工业

复合体(academic-industrial complex): 以几百种高明的新方法制造新知识的巨型系统。我们生活在知识制造者的时代,正是他们送出了保鲜番茄、GM 玉米和致癌鼠作为他们的“先锋”。^[2]



这就是堂娜·哈拉维与保鲜番茄或致癌鼠之间的后现代相遇的内在意义，也隐含着我们自身与变异的大豆之间的后现代相遇的内在意义。我们不需要爱它们，或者甚至买它们。但哈拉维坚持说，我们需要站出来为它们的涵义作证，为它们象征的世界作证，在这个世界中，它们和我们都可能成为同类受害者或同类继承者。知识和动物现在是重叠的范畴，在这个时刻，所有其余的古老的“属”都将依次重叠。这个新的千禧年是转基因的时代。

转基因的千禧年

The Transgenic Millennium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他在晚期的作品《超越善与恶》中要求我们认识“人的全面性和多重性”。

转基因的千禧年^①

我们以这个世界是否不久就会看到基因食品的持续作为开始。哈拉维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存在不会离我们而去。那些蔬菜变种不会返回到它们的太空舱并启程回家。原因与食品市场经济学、消费者需求、超市零售系统或者对健康和冒险的态度没有多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只有短期的影响。但是,《谨慎的 _ 见证者》显示,这些食品和食用作物代表着一个新时代,一个拥有多种其他体现——从“数据库”到大学,从为

^① 本节标题的原文是“The Transgenic Millennium”。Millennium,也就是我们一般翻译的“千禧年”,是一个宗教用词,出自《圣经·启示录·第20章》,指耶稣及其门徒统治世界的一千年太平盛世或黄金时代。而这里却成了“Transgenic Millennium”,即转基因统治下的一千年太平盛世。——译者

用户订制的老鼠到生物计算机芯片——的时代。是的,这是“超级资本主义”的时代,就像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表述的那样,这个时代,我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23]之中。但是这里也有巨大的创造力在发挥作用。有时,这听起来好像仅仅是在兜售政治上的陈词滥调 (political cliché-mongering)——冷静的不列颠 (Cool Britannia)^①和所有那些废话。然而哈拉维表明,有某种东西正在经历着更加真实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可怜的老鳔鱼化番茄退缩,也存在一些不祥的因素。

哈拉维并不试图说服我们去购买基因产品。实际上,这本书把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的不确定性留给我们。但她在警告我们不要只满足于一些反基因的讨论,同时要承认我们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正在改变着。我们必须更新所有支持和反对各种怪诞的新食品的理由以及支持和反对所有其他存在和概念的理由。在《谨慎的 _ 见证者》的核心,有一个“时间”视野 (vision of ‘the time’)。在我们向哈拉维反对妄下结论

① Britannia 是英国(Britain)的女性化称谓。——译者



(anti-conclusion)、拒绝安于一种固定的反应或判断的方向前进的时候,这个视野正是我现在希望去探索的。

在整部《谨慎的 _ 见证者》中,有一个系统地建立起来的概念叫做“时代主题”(chronotope):代表着时代的那些现象。从字面上看,“时代主题”定义了一段时期内的“主题性的”(topical)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能让时代在其中找到它涵义的形象(images)和理念、客体和事件(events)。对于哈拉维来说,当前时代的中心主题是“基因和计算机”。^[24]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符号,它们的出现是我们借以组织我们在历史上的自我感觉的手段。基因和计算机是我们定义什么使我们的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方式。理所当然,对计算机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现象有着错综复杂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哈拉维并不是说,仅仅因为某种东西是时代主题,我们就不得不崇拜它,或者甚至喜欢它。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能正好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它,那你就错了。

说出某种东西是不是时代主题的一个办法是试着对它根本不抱任何看法。如果它真的是时代的定义性主题之一,你就很可能发现,你对它有一些多余的

看法,有些是敌意的,有些是受欢迎的。甚至尝试忽视基因和计算机的存在也成了一种基本态度的表达。你关于基因的思考不仅仅是你的又一种理念或价值观。这些东西是核心价值观,它们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影响。你能很容易地看出为什么计算机是一个定义性的主题。想一想所有关于千年虫的那些担忧,日常生活的多少个方方面面突然间好像都与电脑联系在了一起。基因同样扩散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在保鲜番茄之后,所有食品都真的是“基因食品”了:改良了的或明显是没有改良的。基因代表着你得病的几率,而基因疗法(gene therapy)则代表着你避免它们的希望。基因是生命可能性的神秘语言。在我们对基因食品的反应中,我们正开始探索我们对整个基因时代的希望和恐惧。

当基因第一次成为一个道德话题的时候,它们都是关于纯洁性的:你的基因有多好,你的家族有多纯洁?现在,关于基因的话题都是关于交换的(crossing-over)^①。铈对化学元素们所做的将同样是转基因生命

^① crossing-over 是生物学术语,一般用来指生殖活动中染色体的交换。——译者



体对有机领域和物种所做的。超铀元素和转基因生命体都是

震撼世界的人造产品……它们在地球上甚至整个太阳系中作为外来者的地位，从根本上并且永久地改变了我们是谁……^[25]

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有一首著名的诗作，叫做“坛子轶事”(Anecdote of a Jar), 在诗中，完整的风景围绕着一个小的人造客体展开。对于哈拉维而言，应该有一首对等的诗叫作“基因轶事”(Anecdote of a Gene)，来讲述番茄里的鳃鱼基因或者它的同伴中的细菌基因的故事。在史蒂文斯的诗中，宏大的群山的全景图(a vast panorama mountains)在坛子面前取得了新的形式(form)。在哈拉维的诗中，太阳系的全景图本身在这些“转基因”面前采取了一种新形状(shape)。

转移基因(migratory gene)怎么会如此重要？在这些移动基因(mobile gene)面前，我们不再能信心十足地谈论“自然”或“文化”。当一篇文章宣布一种改良蔬菜将“天然地”(naturally)抵抗疾病之时，这正是“自然”(nature)范畴不再存在的一个小的征兆。它已经被

一个至今还没有新名字的混血儿取代。然而“自然”和“文化”又不同于所有其他旧范畴：它们与我们用来定义和评价我们自己及我们生活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理念都连结在一起。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性格看成是部分由自然赐予，部分通过参与文化活动而习得的东西。过去四百年里，人们激烈地争论着“自然”在多大程度上把我们塑造成我们所是的那样，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又是“养育”(nurture)的结果。你可以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看到这些争论的出现，你也能在当前关于教育和社会政策的两难问题中找到它们的直接后裔。然而，每次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要使用自然和文化的概念来为我们的目光定向。向上看，那里有自然的客体——比方说，天空，或者那些云朵。在地平线上，那些形状是人造的——房顶的线条或飘扬的旗帜。我们已习惯于在世界中区分自然和文化，并且一眼就能区分出各种模糊的东西。比如说，培植鲜花的土地是被耕耘过的自然。但是我们也把行动看作是自然或文化的。这一种行为是自然的，比如说，想要一个家是自然的，而想要往墙上贴塑料鸭子则是文化的。不再这样了：在基因转



移后,如果哈拉维是正确的,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忘却这些习惯。

事实上,她相信,这种区分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是一种幻觉。而现在,这种幻觉被一系列出现在我们眼皮底下并挂在我们嘴上的新事物击得粉碎:“有影响的范畴彼此融会。”在哈拉维看来,西方文化正处在一个真正深刻的转变的时期。这就是她在与怪物番茄以及其他基因新存在的相遇中表达的意思。

所有文化都依赖于范畴。它们是区分世界的方法,没有这些区分,我们确实完全没有机会去建构一个世界,因为我们将面对的只是一片浮动的阴影。最近的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像乔治·勒可夫(George Lakoff)的《女人、火和危险事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探索了范畴在文化形成中的中心作用:自然和文化、火和水、土地和空气、身体和灵魂、雄性和雌性,全都各司其职。然而,正如勒可夫表明的那样,范畴从来不是干净整洁的箱子,它们是有关思想和经验的涌动着的潜在物。^[27]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哈拉维一直致力于分析遗传下来的范畴的失败以及新范畴的潜力。现在,在致癌鼠和女性男人

的时刻,她感觉到一个对西方思想中的所有范畴都有影响的变化。我们正在离开认为把我们的范畴——比如自然和文化、雄性和雌性——当作固定的和界限分明的实体看待是合理的那个时代。范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但是现在,在第二个千禧年,我们正在见证混合范畴的诞生。甚至,这种区分似乎也不再是固定的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学着生活、思考,甚至体验。

要看出这种变化有多么深刻,我们可以从哈拉维转回到范畴概念在西方思想中最早诞生的地方——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著作《范畴篇》(*The Categories*)¹²⁸。在那里,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试图定义两个东西共享同一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举出一个反常现象作为他的第一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和一幅肖像都可以被恰当地叫作‘动物’,但这是模糊的(equivocally)命名。”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把动物范畴同时用于一个活人和他的肖像,那么这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范畴的。相反,当你说“一个人和一头公牛都被叫做‘动物’”的时候,此时的情形就不再是模糊的了。于是,范畴是统一的和清晰的。所以,范畴的



第一个例子是“动物”，并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恰恰是在自然和文化相遇并被加以区别的边界上。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动物”是原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y)。如果你不能说出“动物”和“非动物”指的是什么，那你不属于他的世界。然而，从巨大的虫蛾转移到土豆的基因又如何呢？确实，它并没有把植物转变成动物，然而，按照哈拉维的话说，它让两个范畴都瓦解了。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我们区分事物(things)和存在(beings)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还给出了第二个例子。这次他想要解释范畴在何处止步。这里他表示范畴的词是“属”(genus)(当代生物学中仍然用着这个词)，他对生物学领域非常着迷：

拿“动物”和“知识”这两个属为例。“有脚的”、“两脚的”、“有翼的”、“水栖的”都是动物的种差(differentiae)。但没有一样被用来区分特殊种类的知识。没有哪种知识因为是“两脚的”而区别于另一种知识。

让我们继续这场对话。哈拉维代表新的千禧年回应道：

……对于我们来说，生物体是不同种类的信息系统 (an information system of a different kind)……

这就是堂娜·哈拉维与保鲜番茄或致癌鼠之间的后现代相遇的内在意义，也隐含着我们自身与变异的大豆之间的后现代相遇的内在意义。我们不需要爱它们，或者甚至买它们。但哈拉维坚持说，我们需要站出来为它们的涵义作证，为它们象征的世界作证，在这个世界中，它们和我们都可能成为同类受害者或同类继承者。知识和动物现在是重叠的范畴，在这个时刻，所有其余的古老的“属”都将依次重叠。这个新的千禧年是转基因的时代。



你不能从哈拉维的书中发现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因食品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你不会放下《谨慎的 _ 见证者》后在下一次购物行程中作出新的决定。你在下次阅读关于基因改良技术的新闻报道时也不会有更加清楚的观点。你不会更有信心地愤怒抨击孟山都公司，也不会更加肯定绿色和平组织及他们的策略。但我想，如果哈拉维的想法更加广为人知，那将是一件好事。这些观念将有助于整个关于基因问题的讨论，包括关于基因食品的争论。

超越善与恶

Beyond Goodies and Baddies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作家,哲学家。她将存在主义道德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著有多部小说和论文,重要的有《达官贵人》、《名士风流》、《女室》、《人总是要死的》。她最重要的作品是《第二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圣经”,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

超越善与恶

堂娜·哈拉维与基因食品之间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相遇有没有某种道德的寓意呢？有一种道德寓意很显然是缺失的。你不能从哈拉维的书中发现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因食品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你不会放下《谨慎的 _ 见证者》后在下一次购物行程中作出新的决定。你在下次阅读关于基因改良技术的新闻报道时也不会有更加清楚的观点。你不会更有信心地愤怒抨击孟山都公司，也不会更加肯定绿色和平组织及他们的策略。但我想，如果哈拉维的想法更加广为人知，那将是一件好事。这些观念将有助于整个关于基因问题的讨论，包括关于基因食品的争论。

哈拉维提出的问题与这些思想家支持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密不可分。我们想从我们的文化理论家和哲学家、我们的科学史学家和政治分析家那里得到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想从那些研究社会、文化和伦理课题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什么呢？我们想让他们排除模糊性，制造一个更加简单的世界，使最好的决定清楚明白吗？我们想让思想家们向我们表明是否给新工党(New Labour)投票吗？我们想要思想家们为我们决定互联网对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是好还是坏吗？你想读到一些将给你留下比以前更多确定性——少一些两难、多一些决定性的观念吗？这样一种角色的候选者有很多。书架上放满了权威的建议和可靠的预言。提供答案不就是专家们的责任吗？

哈拉维对思想家的责任有着不同的观念。她的作品当然不是中立的，在很多问题上，她都有她的立场。但整体的效果不是减少世界的模糊性。相反，哈拉维留给我们更多的是集中在对事物真实的模糊性的感觉上，这种模糊性将必须是我们选择给出的任何答案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作出的任何承诺的一部分。根据哈拉维的研究，模糊性和承诺走到了一起。



这就是“成熟的”承诺所涉及的一切：认识世界的模糊性，包括一个人自己的位置的模糊性。

在另一种语境下，哈拉维一直是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作品的坚定仰慕者。在我们回到基因论战的混乱世界的时候，我认为波伏瓦的著作《模糊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mbiguity*, 1947)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透视哈拉维本人思想之价值的视角。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灾难时期写作的波伏瓦来说，任何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要想使世界看起来更少模糊性将是高度不负责任的。在她看来，这样的研究将会毁灭所有相关的人们的人性：

要获得真理，人就不能竭力排除其存在的模糊性，相反，人要接受认识到它的任务。^[1]

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 中，波伏瓦重新评价了“人”这个习惯用语，哈拉维在她对“女性男人”的处理中继续了这项事业。同时，包含在这句话内就有一个内涵丰富的关于“存在的……模糊性”的概念。在这种研究中，思想家的任务是帮助人们领悟他们自身存在的全部模糊性，领悟由那些存在见证

的这个世界的模糊性。没有人能够指责不作承诺的波伏瓦：她是当代作承诺的思想家的一个楷模。但是，她的承诺包含着对模糊性的拥护。

我相信，在最广阔的视野中，哈拉维对基因论战的探索坚持了波伏瓦的“模糊性伦理”。哈拉维论点中的每个词语都向着确定的方向推进，但这种推进都带着持续的模糊性意义。

这次内部的爆裂 (implosion) 是从美妙的赛博格寓言 (bestiary of cyborgs)^① 中发出的……

你能感到这一时刻的危险，同时也能感到视野变化的兴奋。不可能有新的，不是从我们的世界发出的，完全纯洁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存在是模糊的，因为我们自己首先把模糊性给予了它们。逃避“这些奇怪基因感染的专利存在”的模糊性就是逃避你自己的模糊性。³¹ 像波伏瓦一样，哈拉维寻求的是一个成熟的承诺。

哲学家尼采 (Nietzsche) 把他晚期的一部作品称为

① Bestiary 是一部中世纪故事集，可译作“动物寓言”，用现实或寓言形式描写真实存在或想象中的动物，并赋予每一种被认为具体化的动物以道德意义上的解释。一些有关自然史的普遍错误概念被保存于这些流行故事中。现在也用 Bestiary 来指代所谓“动物寓言”的现代版本。——译者



《超越善与恶》(*Beyond Good and Evil*) (又译《善恶的彼岸》)。其中，他要求我们认识“人的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和多重性(*multiplicity*)”。^[32]从波伏瓦到哈拉维，也许我们能够开始在一个超越善恶的世界做出我们自己的承诺，但其中的问题不会让我们为自己做决定。

当你转回到关于基因食品的持续争论的时候，我想你能看出为什么这种模糊性的伦理会是如此重要。在争论的一方，你看见一群奋起捍卫进步的人：

知名的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与 100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科学家一起签名“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科学家宣言”(Declaration of Scientists in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T.商界》，2000 年 2 月 21 日

万一你还是摸不着头绪，你就会被仅仅告知谁是谁：“诺曼·布劳格被认为是‘绿色革命之父’。”但随后在另外一方，你也会看到一群人——守卫着英国海岸线以防外国侵略者侵入的勇敢且装备良好的老水手：

环保激进分子拦截了一条装载着基因改良大豆的轮船，并且发誓留在船上直到这批货物返回美国……

www.ITN.co.uk, 2000年2月25日

此种英雄形象似乎在反方向上提供了一种对存在的模糊性的逃避。然而，欢迎模糊性并不意味着走上一条美好清洁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在关于基因食品的中间立场的讨论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模糊的，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以下就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试图认识模糊性并一直保持正确的话语：

“潜在的好处突显了为什么我们在没有进一步研究之前并不关上基因食品或作物的大门是正确的。潜在的坏处表明了为什么我们异常谨慎地进行操作确实是正确的。”

www.ITN.co.uk, 2000年2月27日

一方有正确的地方，另一方同样也有。这确实是一种模糊性伦理的逆转。

相比之下，哈拉维提供了一个我们能认识这些奇怪的新存在的“整体性和多样性(multiplicity)”的空



间，这种多样性在很多方面是反过来欢迎我们的我们自身创造能力的反映。尤其是，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和这些新的可能性的亲缘关系，无论作为牺牲品还是作为英雄。什么东西超越了善恶，超越了那些旧的范畴？乌托邦理想本身超越了旧的定义而幸存下来了吗？根据这场后现代的相遇，我认为任何理想的未来都将是一种拥抱模糊性的未来，而不是一种消除它或重新定义它的未来。哈拉维把这样一种前景命名为“非均衡的福祉”(heterogeneous well-being)，这是对模糊性的实践而不是退回到定义之中。^[33]

进一步阅读书目

我希望这个讨论能鼓励读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入堂娜·哈拉维的引起争议的主要著作：《谨慎的_见证者 @ 第二个千禧年. 女性男人©遇到_致癌鼠™》，与本书主题有关的中心内容在第二部分的第2节：“女性男人©_遇到_致癌鼠™”。这部分涵盖了赛博格、转基因生命体、女性男人和致癌鼠，所有这些都是从跨边界性和模糊性视角来看的。接着，与之最富于联系的是第三部分的第6节：“种族：吸血鬼文化中的一般献血者(Race: Universal Donors in a Vampire Culture)”(pp. 213—66)，争论中所有关于道德和政治的推论都在这里展开。

哈拉维的思想总是产生丰富的相互联系。在《谨慎的_见证者》中，这些联系回到了她最丰富的选集：《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在这里，读者能够找到那篇著名的关于赛博格的论文的一个版本，标题是：“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这篇文章也可以在林达·J.尼科尔森(Linda J. Nicholson)编辑的《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一书中找到，标题是“赛博格宣言 (A Manifesto For Cyborgs)”。该文的第一版出现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 15.80 (1985)上。在克里斯·哈布尔斯·格雷(Chris Hables Gray)编辑的《赛博格手册》(*The Cyborg Handbook*.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中有系列回应和对话，其中N.凯瑟琳·海利斯(N. Katherine Hayles)的“赛博格的生命循环(The Life Cycle of Cyborgs)”尤其相关。而哈拉维自己的《赛博格宝宝》(*Cyborg Bab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8)从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问题入



手,进入到一片截然不同的道德领地。

最后,《谨慎的 _ 见证者》属于尝试理解科学、技术和文化之间新关系的一组名著中的一本。与之最相关的著作是: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Manuel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1997).

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注 释

- [1] 哈拉维最著名的独立作品是最初出版于 1985 年并被多次重印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 收录在她的自选集《类人猿, 赛博格和女人》中。在那里她进行了一次从女权主义者到科幻未来领域的跳跃。关于哈拉维作品的更多信息见进一步阅读书目。
- [2] Donna J. Haraway,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62.
- [3] 同上书, 第 88 页。
- [4] 对这种番茄的基因和它可疑身世的鉴定在《谦逊的证人》第 59-60 页。
- [5] 超铀元素和新遗传学被插在《谦逊的证人》第 51-56 页的上下文中。
- [6] 同上书, 第 85 页。
- [7] 同上书, 第 57 页。
- [8] 同上书, 第 60 页, 就是在这里哈拉维以她独特的风格做



注

出了表白。

- [9] 同上书,第 88-89 页,在“亲缘革命”(the revolution in kinship)一节。
- [10] 哈拉维代表她的赛博格做出的声明在《谦逊的证人》第 12 页,除此之外还有机器人和人的定义,在第 59 页。
- [11] 《谦逊的证人》第 79 页逼真地描写了致癌鼠出现时获得的反响,此外还有机器人和人的定义,在第 59 页。
- [12] 对待超资本和全球化的态度出现在《谦逊的证人》第 12-14 页。
- [13] 同上书,第 54 页。
- [14] 对种族主义者反应的慷慨激昂的批评被转入《谦逊的证人》第 60-62 页的叙述。
- [15] 正如这些引用表明的,现实的、纯洁性主题回荡在整部《谦逊的证人》中。纯洁殿堂标记在第 86 页,外来基因来自第 62 页,关于基因再混合的思想在第 121 页。
- [16] “谦逊见证”(modest witnessing)的历史和批评在《谦逊的证人》第 22-24 页。
- [17] 同上书,第 8 页。
- [18] 深入的讨论从第 52 页“啮齿动物的观点”(the rodent viewpoint),到第 70 页“女性男人”(FemaleMan)和第 84 页“叙事本身”(narrative itself),随着《谦逊的证人》不断演化。这一讨论的扭曲形态协助传达了本质的思想。
- [19] 同上书,第 121 页。
- [20] 同上书,第 80 页。
- [21] 对新研究机构的分析落实在《谦逊的证人》第 90-97 页。
- [22] 对世界和它们的知识分析在《谦逊的证人》第 37 页。
- [23] Anthony Giddens, *The Runaway World* (London: Profile,

释

1999).

- [24] “时代主题”的介绍在《谦逊的证人》第 41–42 页。
- [25] 同上书,第 55 页。
- [26] 同上书,第 68 页。
- [27]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28] Aristotle, *The Categories*, translated by H.P. Cook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例子出自 Book I 页。
- [29] 《谦逊的证人》,第 97 页。
- [30] Simone de Beauvoir, *The Ethics of Ambiguity*, translated by B. Frechtman (New York: Capitol Press, 1996), 第 13 页。
- [31] 这一内爆的寓言集的视角出现在《谦逊的证人》,第 43 页。
- [32] 这段引用出自《尼采语录》(*The Portable Nietzsche*),由 W. Kaufmann 编辑翻译(New York: Penguin, 1954),第 445 页。
- [33] 这个关于一种新福祉的断言是在《谦逊的证人》第 95 页做出的。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